

附录 文物与岭南地区汉代居民的生计方式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姚妍晶

生计是“人们维持生活的计谋或办法”，生计方式则是“人们相对稳定、持续地维持生活的计谋或办法”^[1]，也就是基本谋生手段。生计方式与人群所处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关系密切，一般分为搜寻食物（即狩猎采集）、原始粗耕、农耕、畜牧和工业化五个阶段。本文主要根据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南越国墓、汉墓出土文物，对汉代岭南居民的生计方式做概略讨论，以期有助于全面了解汉代岭南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面貌。

有关岭南地区汉代生计方式的论述见于《西汉南越王墓》第十二章的“农业经济”“重要的手工业”“交通与贸易”诸节^[2]，《岭南古史》^[3]《南越国史》^[4]《百越民族史》^[5]《百越民族文化》^[6]等专门史、民族史著作中亦多有讨论。专题论文主要集中在农业领域^[7]，比较关注铁农具、牛耕、水稻种植技术、农副产品和粮食存储等内容，包括动物食品^[8]等。此外，《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9]《汉代考古学概说》^[10]等专著中也零散见有相关内容。

秦汉中央政府多次徙民南下，与越人杂居，并且倡导农耕，将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传入岭南地区，岭南地区的家畜饲养业随着中原文化的影响而成熟，岭南地区居民的生计方式更加复杂化。狭义的生计方式是指直接从自然界获取资源的方式，广义的生计方式还包括通过手工业、纺织业、贸易、工业等间接方式获取资源。本文主要讨论汉代岭南地区的农业、渔猎捕捞、家畜饲养等基础生计方式，还包括与其相关的庖厨饮食等内容。

一、汉代文物中的农业生产经济

狭义上的农业就是种植业，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和绿肥等农作物的生产活动^[11]。汉代居民对农业的理解朴实简单，《汉书·食货志》称“辟土植谷曰农”，不包括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副业等广义农业的内容。本文主要讨论农作物种类、农业生产工具、农业生产技术、粮食存贮方式等情况。

岭南大部分地区跨越北回归线，属于亚热带和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为大陆性气候和海洋性气候的过渡地带，年均降水量一般在1500毫米以上，农作物一年二熟甚至三熟，农耕条件优越。《史记》《汉书》两书记载赵佗从中原地区输入铁农具和牛、羊、马等牲畜，东汉九真太守任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12]，这些举措极大促进了岭南地区的农业发展。

（一）农作物种类

随着中原地区先进农业生产工具和种植技术的传入，汉代岭南地区的水稻种植得以推广，广州汉墓^[13]东汉后期 M4029 出土陶仓内有炭化稻米，中山大学校园东汉墓^[14]前室陶案上堆叠有 3 公斤稻谷，广两贵县罗泊湾^[15]一号墓出土木牍记有“客粳米一石”，说明引进了稻谷新品种。汉代岭南地区除传统的粳稻、籼稻外还栽培了糯稻^[16]，东汉杨孚《异物志》记载“稻，交趾冬又熟，农者一岁再种”，说明出现了双季稻。

汉代岭南地区还有黍、粟、甘薯、大豆、薏米、芋等粮农作物。西汉前期广州汉墓 M1134 出土陶瓮内装有半瓮黍粒，东汉前期 M4013 的提筒内装有高粱，广州马鹏岗西汉墓^[17]的陶瓮内盛有小米和梅子，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出有稻、粟、大麻籽、芋及葫芦、黄瓜、冬瓜种实。黍、粟等粮食作物的种植应当与中原人口迁入引起的饮食结构变化有关。

岭南地区汉代经济作物主要是甘蔗、茶树和花生（千岁子），瓜果作物主要有橘、柚、柑、荔枝、龙眼、椰子、杨梅、槟榔、甘蔗、橄榄、枇杷、杨桃，以及西瓜、桃、李、酸枣、梨等；菜蔬种类有芹、菁、黄瓜、甜瓜、葫芦瓜、姜、花椒、南瓜、茄、蚕豆、菰、芋等^[18]。岭南地区的水果是皇室贡品，被视为珍异品，《汉书·地理志》记载南海郡有圃羞官，岁贡龙眼、荔枝、橘、柚等，《西京杂记》记载赵佗曾向汉高祖进贡荔枝。

广州象岗南越王墓^[19]外藏椁出土的 17 件陶瓮和 4 件陶罐内有果品残骸，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20]出有橄榄核。广州汉墓出有果蔬粮食种实，如西汉前期 M1134 陶瓮内有许多梅核，M1048、M1134 陶罐内有梅子；西汉中期四耳罐内有橄榄、酸枣和梅子，M2050、M2060 五联罐内有乌榄、橄榄、梅子、酸枣、李子等；东汉前期 M4013、M4019 出有橄榄、人面子、乌榄、梅、李、花椒、橄榄叶、稻谷等（图一）。



图一 东汉前期广州汉墓出土果蔬粮食种实（梅、李、花椒、橄榄、人面子、橄榄叶、稻谷）

（二）农业生产工具

岭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原来比较落后，时人称为“江南火耕水耨”^[21]，秦汉时期白中原地区传入的农业生产工具大力推进了岭南农业的发展。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东阳田器志》木牍记有耨、锄等农具，每项数量少则 20 件，多则四五十件。汉代岭南地区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有耨、铲、镬、刀、锄、镰、杵、臼等，绝大部分为铁制，

适用于开地、播种、中耕、收割、加工等农耕环节，种类、形制均与中原地区相似。

用于松翻平整土地的工具具有锄、铲、镢、刀、犁等。

锄是汉代最常见的农具，可以用来开掘沟渠和做垄。东汉刘熙《释名》称“耨，锄也，锄地起土也”。中原地区铁锄的刃部呈“V”形、“U”形和“凹”字形，岭南地区的铁锄以“凹”字形为多。广东博罗银岗遗址^[22]出有2件铁锄(G3:116和T0208②:11)，锈蚀严重；深圳叠石山遗址^[23]出有1件铜锄(T4②:7)，呈“凹”字形(图二:1)；广州象岗南越王墓东耳室出土的3件铁锄刃口圆弧，刃角上翘，内侧用来装纳木叶及柄(图二:2)。此类形制的铁锄汉代多见于长江以南地区，如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填土中的木柄铁锄^[24](图二:4)。广西平乐银山岭汉墓^[25]出土铁锄14件，其中一件三角形铁锄的形制较特殊(图二:3)。

铲作为农具可以用来耘苗、铲土、松碎表土、锄草等，用途广泛。《释名》称“铲，平削也”，元代《王桢农书》谓“铲柄长二尺，刃广二寸，以铲地除草，此古之铲也”。象岗南越王墓西耳室出有2件铁铲，双肩有柄，方釜，内有朽木，弧刃较宽展(图二:5、6)。此类形制的铁铲在中原地区较常见，是主要中耕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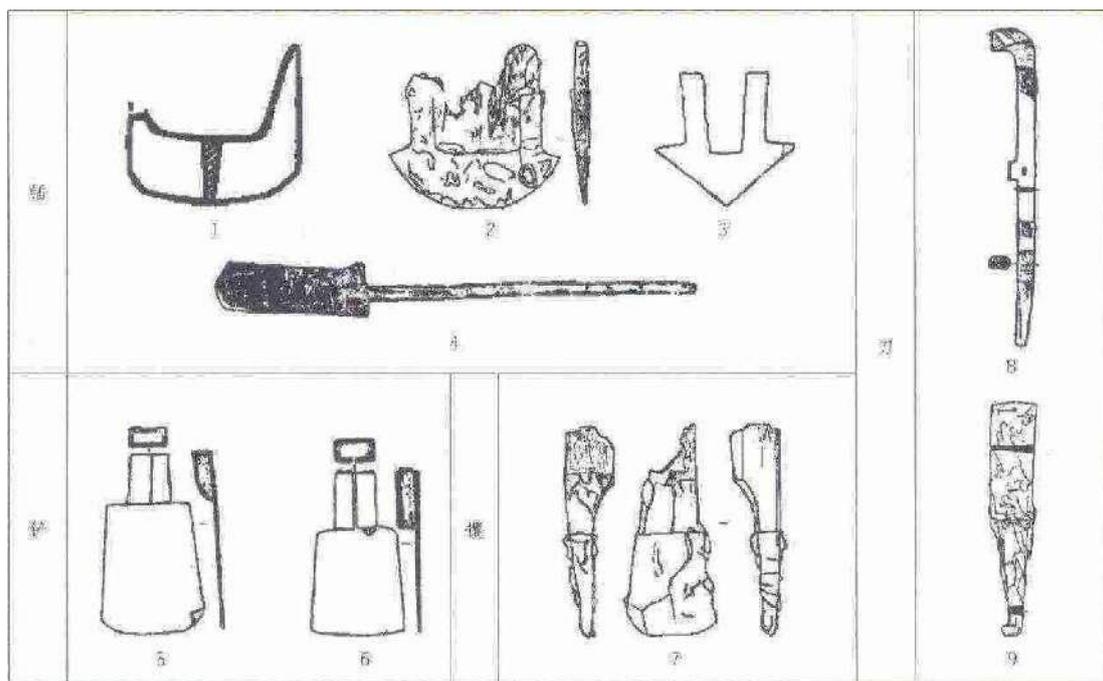
耨是一种翻土、起土农具，同锄一样可以用来开荒掘土。《淮南子·精神训》云“今夫繇者揭耨、锄，负陇土”。耨也便于刨树根和除草，功用同锄，所以《释名》称“耨，大鋤(锄)也”。耨按照釜部分为横向、纵向两类，岭南地区汉代所见形制均为横向穿孔，如象岗南越王墓东耳室的2件，刃口弧形，顶端釜口内套纳木叶，木叶上端有一横穿孔，当安装横柄(图二:7)。

岭南地区汉墓中有一类经常与铁削等同出的铁刀，应当属于农具，如曲江马坝西汉前期墓^[26]出土的楔形铁刀(M1:8)。岭南地区多灌木丛林，农用刀具主要是弯刀、劈刀等，用来劈竹伐木、砍柴割草。象岗南越王墓西耳室出土的铁弯刀扁长形，单刃，柄上夹木片并缠藤条(图二:8)；劈刀4件均为长方形，单平刃，刃脊较厚，柄部夹木板并缠绳(图二:9)。广西梧州、合浦、贵县、平乐等地汉墓亦出此类较为厚重的铁刀及铁斧，当为砍伐工具。

犁(铧)由耜发展而来，《说文》释：“犁，耕也。”象岗南越王墓后藏室的陶罐G19、陶瓮G18和铜提筒G47中出有黄牛骨。岭南本地产水牛，汉代岭南地区黄牛、水牛的饲养为推广牛耕提供了条件，《后汉书·任延传》记载东汉建武年间牛耕已经推广到交趾地区九真郡^[27]。岭南地区发现最早的2件铁犁铁铧出土于广西贺县莲塘东汉墓^[28]，三角形，正面隆起，中空，可容犁头；佛山澜石东汉墓^[29]水田模型中见有“V”字形犁铧模型。

农业生产还要经历锄草、松土等中耕环节。岭南地区汉代中耕的锄草工具主要有铁铲和铁锄。《王桢农书》记载铲的用法为“两手持之，但用前进撻之，划去杂草，就

覆其根，特号敏捷”，铲的肩部较平，便于足踩。铁锄是岭南地区汉代常见农具，《释名》称“锄者，助也，去秽助苗长也”；又作“鉏”，《说文》释“鉏，立薶斫也”。锄的形制与锛、耨相似，但是横装木柄，可以用作中耕、松土、培土、间苗等工具。广州汉墓出土铁锄均为“凹”字形，釜内横装木柄。广西贵县、合浦、全州等地汉墓出土的铁锄分为两种，一种为方直裤式，一种为半环圆刃式，与广州汉墓出土铁锄的形制基本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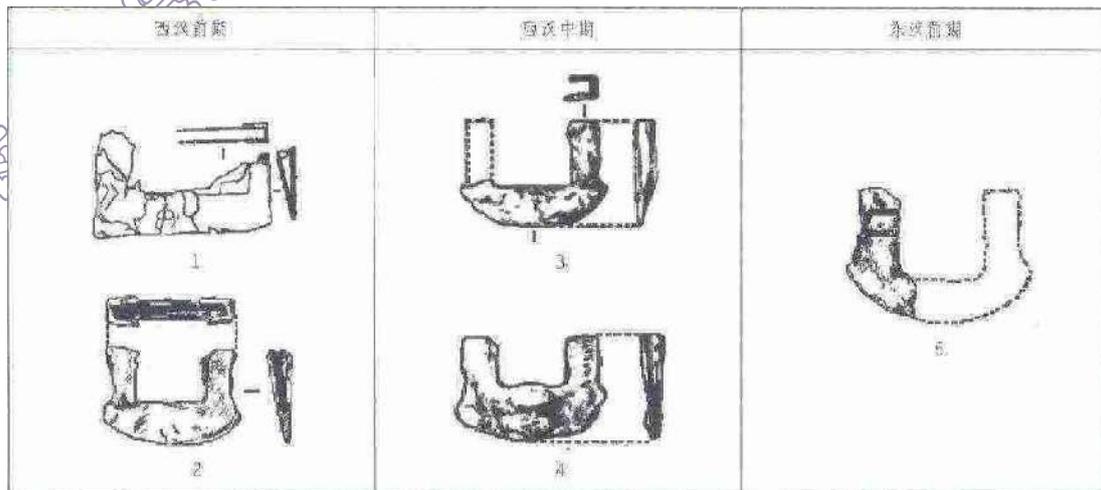
1. 深圳叠石山 T4②:7 2. 象岗南越王墓 B41 3. 平乐银山岭 M27:5 4. 长沙马王堆 M3 5. 南越王墓 C145-14
6. 南越王墓 C145-14 7. 象岗南越王墓 B37 8. 象岗南越王墓 C121-26 9. 象岗南越王墓 C116

图二 岭南地区出土的汉代松土整地农具——铁锄、铁铲、铁耨、铁刀

西汉前期铁锄按照刃部形制分为两种，一种刃部宽平，釜部两侧较竖直，如象岗南越王墓东耳室 B40-1(图三:1);一种刃部两角上翘，釜部略外撇，如广州汉墓 M1005:18(图三:2)。西汉中期铁锄的刃角上翘，根据釜部外廓分为两种，一种外廓竖直，如广州汉墓 M2010:016(图三:3);一种外廓外撇，如广州汉墓 M2017:0335(图三:4)。东汉流行釜部外撇的铁锄，如广州汉墓 M4022:6(图三: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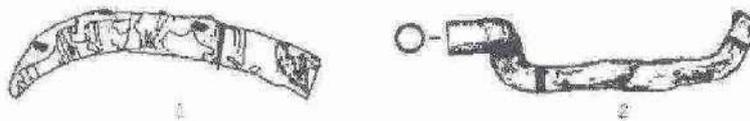
镰主要用来收割水稻。岭南地区最早的镰出土于罗定背夫山战国墓^[30]，为铜制品。两汉前期出土铁镰主要有弯月形和弓形两种，弯月形铁镰见于象岗南越王墓西耳室，前端渐收束，后端平齐(图四:1);弓形铁镰如广州汉墓 M1117:5，柄部圆筒形(图四:2)。广西贺县、贵县、平乐等地汉墓亦出有弯月形铁镰，与中原地区形制一致。

岭南地区汉代的粮食加工工具主要有杵和白、磨，用于谷物脱皮。出土的杵、白有些是实用器具，有些是放在陶屋里的陶明器。



1. 象岗南越王墓 840-1 2. 广州汉墓 M1005:18 3. 广州汉墓 M2010:016
4. 广州汉墓 M2017:0335 5. 广州汉墓 M4022:6

图三 岭南地区出土的汉代中耕农具——铁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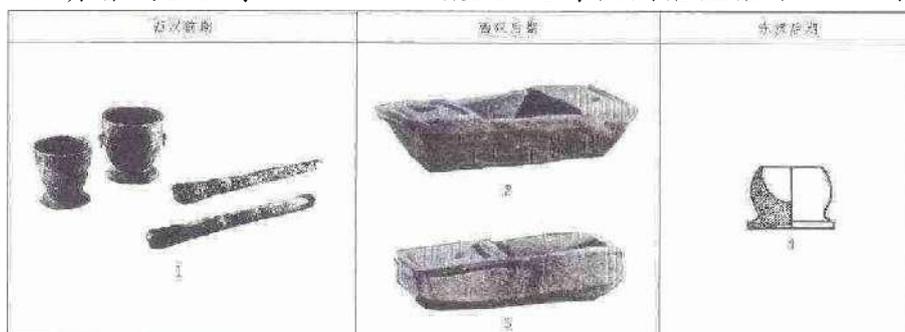


1. 象岗南越王墓 C72 2. 广州汉墓 M1117:5

图四 岭南地区出土的汉代收割农具——铁镰

实用杵、臼以广州象岗南越王墓西耳室出土的两套为代表（图五:1），一套为铜杵臼，一套为铁杵铜臼。其中，铜杵(C168-1)中间为圆柱形，两端为八棱柱形；铁杵(C168-2)手握一端为攒尖形，捣研一端有木痕。两件铜臼形制不同，C169-1为圆筒形，平底附假圈足；C169-2较小，呈喇叭筒状，小平底附座足。

西汉后期的明器陶臼与东汉陶屋内陶舂米俑使用的陶臼形制相同，木杵多已朽。西汉后期广州汉墓 M3020 出土的陶臼略似船形（图五:2）；M3013 出土的箕形陶臼，一端小而高，一端大而低（图五:3），两汉后期至东汉时期陶屋中的杵、臼大都与这两种形制接近。东汉后期广州汉墓 M5060 出有圆形陶臼，显得厚重（图五:4）。磨盘实物没有发现，东汉后期增城金兰寺 M5^[31] 出土陶屋里见有使用磨盘磨米的人俑。



1. 臼、杵（象岗南越王墓 C168、C169） 2. 臼（广州汉墓 M3020:11）
3. 臼（广州汉墓 M3013:2） 4. 臼（广州汉墓 M5060:31）

图五 岭南地区出土的汉代粮食加工工具——杵、臼

（三）农业生产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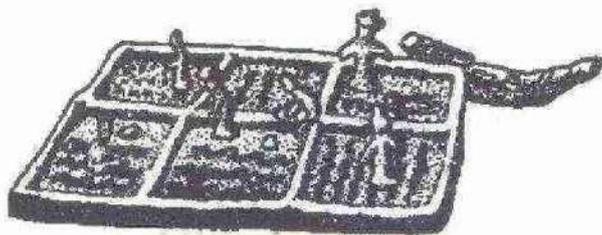
从出土农具中可以看到，岭南地区汉代居民的农业生产包括整治田地、播种、中耕、收割、加工等环节，与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体系一致，不过在各生产环节使用的农具种类不及中原地区丰富，表明农业生产仍然相对落后。

岭南地区汉代整治田地的工具主要有锛、铲、耨、刀、犁等，流程应该是先用刀、斧一类农具清除地表杂草灌木，或者直接烧火除掉地表植被，再用锛、耨、铲、犁等工具翻土开荒或平整田地。中原地区汉代整治田地的农具还有耒，《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释“耒，手耕曲木”，功用与锛相似，但一般有双齿。现今西南地区仍然使用耒，贵州壮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用它来耕田翻土^[32]。

岭南地区没有发现汉代的播种农具，推测当时采用“随犁撒播”和“锄穴点种”方式。前者见于江苏泗洪、睢宁和陕西绥德等地东汉画像石，农人随行在耕犁后面，一手提篮筐一手撒播；后者用锄头刨开田地，撒入种子。岭南地区汉代或许还有不制田垄、直接撒种的“漫种”方式。中原地区汉代除这些播种方式外，还有“耨车播种”和“匏种”，中原地区汉墓中常出有铁耨铍，汉墓壁画上也见有耨播场景。

岭南地区汉代的中耕农具为锄、耨，主要用来锄草、松土。中原地区汉代的中耕工具还见有耘犁，锋刃“V”形，用牛牵拉锄草。西汉《汜胜之书》还提到一种锄草工具——钩形镰。岭南地区和中原地区的收割工具均以镰、刀为主。岭南地区汉代多用杵、臼加工脱皮粮食，磨很少见。而中原地区的粮食加工工具还有舂碓、磨和扬扇，舂碓多见于四川画像砖，江苏泗洪重岗画像石上见有磨壑。

秦汉时期南方地区的稻作农业常采用“火耕水耨”的耕作方式，即利用草木灰烬作为天然肥料，较为粗放，不过中耕除草、粗具农田排灌设施等已经体现出进步因素^[33]，汉代岭南居民已经掌握了牛耕技术。《史记·南越列传》记载，赵佗致书汉文帝要求引进畜种，“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应该是指引进黄牛。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有黄牛骨骼，岭南汉墓出有黄牛、水牛陶俑。



图六 佛山澜石东汉墓出土水田附船模型

东汉后期广州汉墓 M5081:27 出土的水田模型四等分为“田”字形，其中三格内有耕作人俑。广东佛山澜石东汉墓^[34]出土的水田耕作模型(M14:21)被分为六块，人俑或在耕犁，或在收割，或在插秧，或在磨镰、脱粒（图六），几乎表现了粮食生产加工的全过程。这件水田模型说明不晚于东汉时期，犁耕技术、水稻移栽技术、施肥改

土技术和一年两熟制等农业生产技术都已经在岭南地区应用^[35]。

岭南地区出土的汉代陶屋多半带有厕所，厕所下方有的连通畜圈；此外还见有厕所附带畜圈的陶制模型明器，如广州横枝岗西汉墓 M4^[36]，说明当时居民已经懂得用厕所、畜圈来积肥、沤肥。佛山澜石东汉墓的水田模型中堆塑出圆形肥堆，说明在当时已掌握施肥技术。

农业灌溉有渠灌和井灌，东汉马援在交趾地区“穿渠灌溉，以利其民”^[37]，南越国宫苑遗址中发现的汉代水井即达数百口。岭南地区雨量丰沛，河流密布，是河渠灌溉的有利条件，佛山澜石东汉墓的水田模型旁边塑出小船，表明农田靠近河流。不过岭南地区汉代没有发现中原地区常见的轱辘、翻车等专门灌溉的工具。

（四）粮食存储设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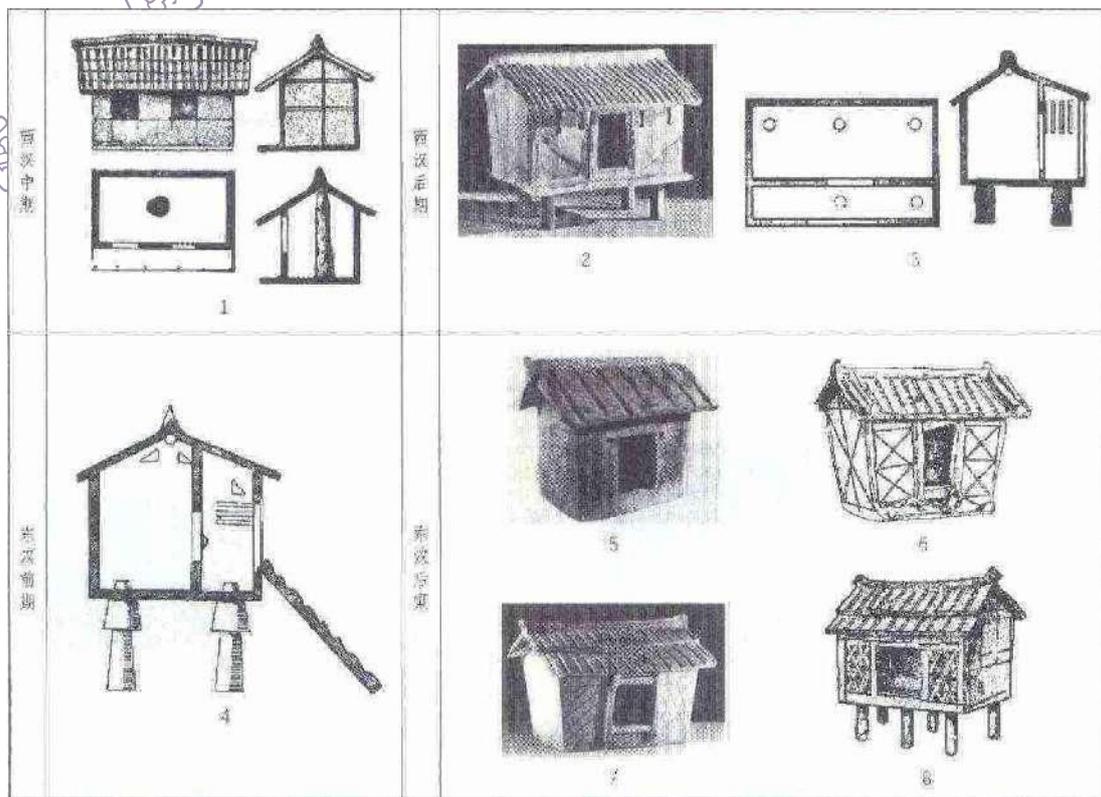
汉代中原地区的谷物储藏设施有仓、廩、庾、京、囷、窖、窰等，岭南汉代粮食贮藏设施主要有仓和囷。《说文》释“仓，谷藏也，仓黄取而藏之，故谓之仓”，释“囷，稟之圆者”。岭南地区汉墓出土一批陶制仓、囷模型明器，年代自西汉中期至东汉后期，其形制结构适应防水防潮、干燥通风、防虫鼠等储存功能。比如陶仓一般为悬山顶，陶囷顶部为伞状，有些为干栏结构，是为了应对潮湿多雨气候；陶仓、陶囷上往往划出菱形、三角纹样来表现窗户，开窗是为了干燥通风以防止粮食霉变。

广州地区汉墓出土的模型明器仓有陶制、木制和滑石雕三种。陶仓顶部有单檐和重檐两种形式；仓房内部有的隔以横廊，据此可以将陶仓分为三型。

A型陶仓为单檐悬山顶，无横廊。如西汉中期广州汉墓 M2060:31，开双门，有地台，面墙上有两排原来安插竹木条的小孔示意栏杆，山墙及后墙刻划线条示意柱枋构架（图七:1）。A型陶仓沿用至东汉后期，开一门，如广东增城金兰寺 M2:18^[38]，无地台（图七:5）；又如广州汉墓 M5080:102，仓房高大，前檐口原或贴有瓦当，门槛前有一人俑（图七:6）。A型陶仓中有些为干栏结构，如广州汉墓西汉后期 M3021:90，仓底有4根陶立柱（图七:2）；东汉前期 M4029:31 仓底有4根竹柱支架，内有灰化谷壳一堆。

B型陶仓为单檐悬山顶，前为横廊，后为仓室。如西汉后期广州汉墓 M3018:47，仓底有6根干栏式陶立柱（图七:3）；广东南海西汉后期 M4 和东汉前期 M3^[39] 仓底有镂空圆洞，原插有干栏式木柱。东汉前期广州汉墓 M4015:52 仓底有6根陶制干栏式立柱，门前有陶板梯，屋脊正中有一鸟（图七: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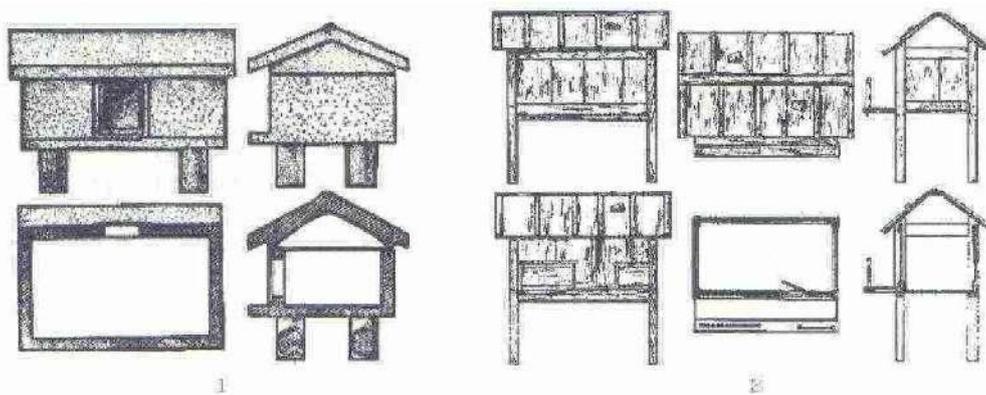
C型陶仓为重檐悬山顶，如东汉后期广州汉墓 M5070:9，无横廊（图七:7）。C型陶仓有些为干栏结构，仓底有4~6个圆孔安插木柱，如东汉后期广州汉墓 M5041:35（图七:8）。



1. A型 (广州汉墓 M2060:31) 2. A型 (广州汉墓 M3021:90) 3. B型 (广州汉墓 M3018:47)
 4. B型 (广州汉墓 M4015:52) 5. A型 (增城金兰寺 M2:18) 6. A型 (广州汉墓 M5080:102)
 7. C型 (广州汉墓 M5070:9) 8. C型 (广州汉墓 M5041:35)

图七 广州地区汉墓出土陶仓

西汉中期还见有石仓和木仓。广州汉墓 M2030:30 为石仓 (图八:1), M2050:29 为木仓 (图八:2), 均为悬山顶干栏结构建筑。



1. 石仓 (广州汉墓 M2030:30) 2. 木仓 (广州汉墓 M2050:29)

图八 广州地区汉墓出土石仓、木仓

广州地区汉墓西汉中期开始流行模型明器陶囷, 一般不与陶仓共出。陶囷为圆形, 即《说文》所谓“囷, 稟之圆者”, 顶部圆鼓如伞盖, 围壁刻划类似竹木结构的线纹, 基本为干栏式建筑。《广州汉墓》推测出土陶囷模仿的“是一种以稻草编织成伞顶, 在木板地台上支架柱枋, 外面围以竹编席笄的简易粮仓。新中国成立之前, 珠江三角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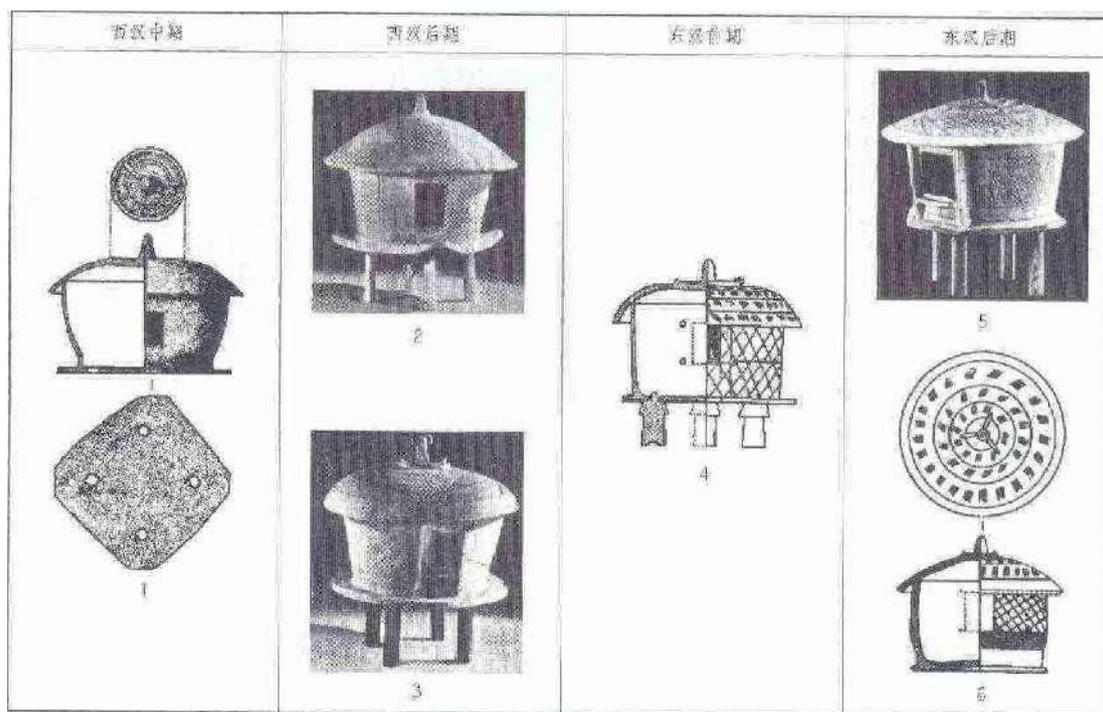
等地区的农村中贮粮的‘谷囤’，基本上还保留着这种样式”^[40]。

根据顶盖结构可以将陶囤划分为两型，A型顶盖上无脊棱；B型顶盖上有一周圆形突棱，顶盖尖突基部与突棱之间有数条放射状脊突，用来表现伞架结构。从西汉中期至东汉后期，各期陶囤形制变化不大。

西汉中期A型、B型陶囤均已出现，B型陶囤如广州汉墓M2022:1，囤底有切角四方形地台，地台穿4个孔，原插有干栏式木柱（图九:1）。西汉后期A型、B型陶囤分别以广州汉墓M3030:91（图九:2）和M3016:28（图九:3）为代表，均为干栏式结构。

东汉前期A型陶囤如广州汉墓M4037:13；B型陶囤如广州汉墓M4039:18，顶盖圆平，在圆形突棱外刻划四周下垂的栉齿纹，表示囤顶是用稻秆编扎、分层叠盖而成（图九:4）。

东汉后期陶囤均属于B型。广州汉墓M5069:51门框突出壁外，顶盖和周壁刻划斜方格纹（图九:5）。广州汉墓5029:14，陶囤门口有一人俑，正举步入内。番禺小谷围东汉后期墓^[41]也出有B型陶囤（图九:6）。



1. B型（广州汉墓 M2022:1） 2. A型（广州汉墓 M3030:91） 3. B型（广州汉墓 M3016:28）
4. B型（广州汉墓 M4039:18） 5. B型（广州汉墓 5069:51） 6. B型（番禺小谷围 M1A:61）

图九 广州地区汉墓出土陶囤

由于气候条件的差异，以及农作物种类和农业生产水平的差别，岭南地区汉代粮食的储藏方式较中原地区简单，如窖、窰等地下储粮设施显然不适用于地气卑湿的岭南。除仓、囤这类粮食存贮设施外，岭南地区汉代的农作物种子多是储存在陶罐等容器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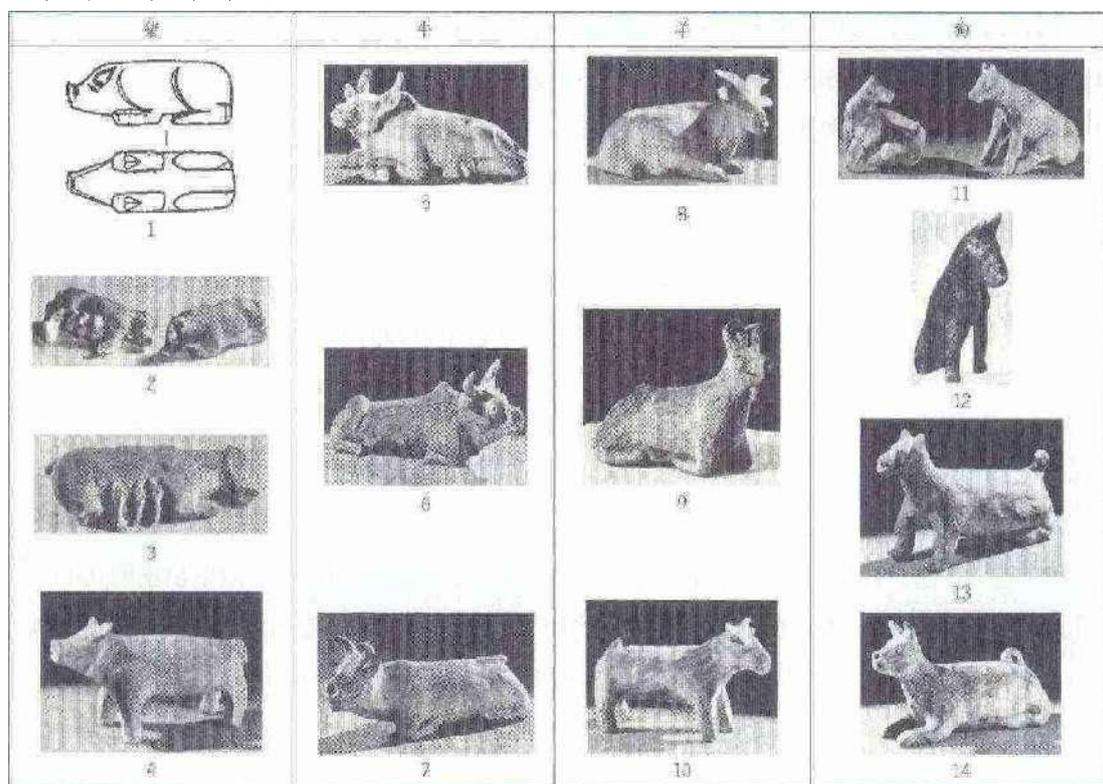
二、汉代文物中的禽畜饲养及渔猎捕捞

《汉书·地理志》记载，粤地“亡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麋麋”，“五畜”当是指牛、羊、猪、狗、鸡。汉代“渔、猎、畜牧、种树之利，皆较田农为饶”^[42]，岭南地区山地丘陵面积广阔，河网密布，海岸线漫长，野生动物资源丰富，家禽、家畜饲养和渔猎捕捞亦是岭南地区汉代居民的重要生计方式。

西汉在南海郡置圃羞官，在交趾郡置羞官，“职责首先是食材获取、加工并且进献膳食原料，同时也与岭南特产果蔬种植栽培以及禽畜水产养殖捕捞、野生动物猎取有关”^[43]。这两种职官仅设置在岭南地区，也与汉代岭南地区禽畜水产饲养和渔猎捕捞活动比较发达有关。

(一) 家禽家畜饲养

1. 家禽、家畜种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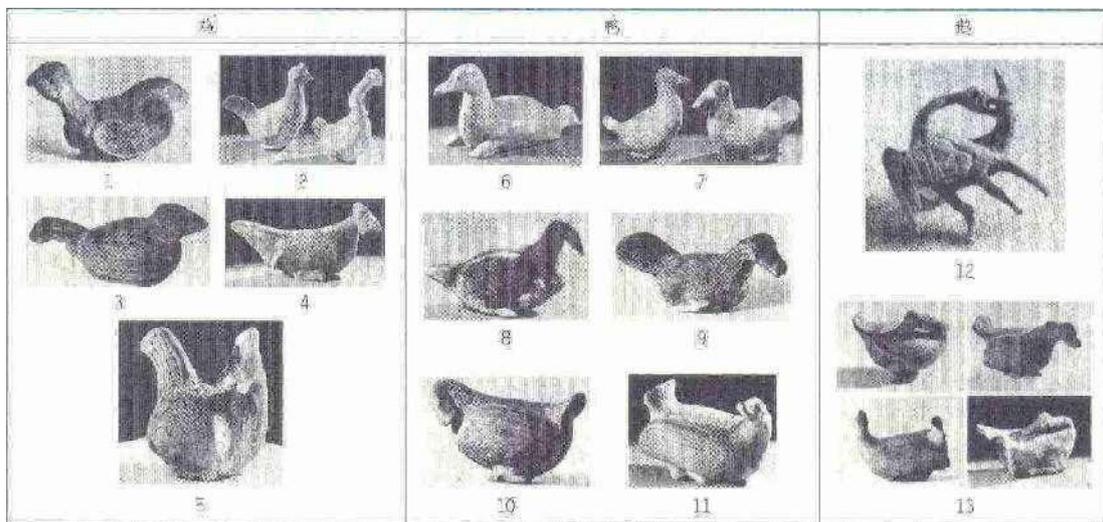
1. 象岗南越王墓 C135 2. 广州汉墓 M3019:51、62 3. 广州汉墓 M4006:14 4. 广州汉墓 M5052:38
5. 广州汉墓 M3019:54 6. 广州汉墓 M5046:20 7. 广州汉墓 M5070:28 8. 广州汉墓 M4001:36
9. 广州汉墓 M5070:33 10. 广州汉墓 M5052:35 11. 广州汉墓 M4006:7、8 12. 广州汉墓 M4029:33
13. 广州汉墓 M5020:23 14. 广州汉墓 M5070:31

图十 广州地区汉墓出土家畜俑

岭南地区汉墓出土的禽畜骨骸多发现在铜、陶容器内，容器底部往往有烟炱痕迹，经鉴定的家禽、家畜种类有猪、黄牛、水牛、羊、鸡等。在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后藏室出土的 100 多件盛贮器具中，包括鼎、壶、提筒、鉴、釜、烤炉等铜器和瓮、罐等陶器在内，约 1/3 见有动物遗骸，种类有黄牛、羊、猪、鸡、鱼、花龟、水鱼、青蚬等，

大部分用编织物包裹后放入。

岭南地区汉代家畜饲养业兴盛的另一表现，是墓葬和遗址中出有许多陶质、石质、木质的家禽、家畜动物俑，造型生动写实，显示当时家畜、家禽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广东博罗银岗遗址^[44]出有西汉初年的陶马(G3:52)，广州象岗南越王墓西耳室出有石猪(图十:1)和骨雕天鹅(图十一:12)，西汉后期广州汉墓出有很多陶质的猪(图十:2)、牛(图十:5)、鸡(图十一:1)、鸭(图十一:6)，东汉前期广州汉墓出有陶猪(图十:3)、陶羊(图十:8)、陶狗(图十:11)、陶鸭(图十一:7、8)、陶鸡(图十一:2)和木鸡(图十一:3)、木狗(图十:12)等。东汉后期广州汉墓和广州黄花岗^[45]、佛山澜石^[46]等地汉墓出土家禽、家畜俑的数量更多，种类更加丰富，如陶猪(图十:4)、陶牛(图十:6、7)、陶羊(图十:9、10)、陶狗(图十:13、14)、陶鸡(图十一:4、5)、陶鸭(图十一:9~11)、陶鹅(图十一:13)。



1. 广州汉墓 M3021:15 2. 广州汉墓 M4006:34、37 3. 广州汉墓 M4029:35 4. 广州汉墓 M5046:24
5. 广州汉墓 M5029:22 6. 广州汉墓 M3019:49 7. 广州汉墓 M4006:31、33 8. 广州汉墓 M4039:15
9. 广州汉墓 M5073:36 10. 广州汉墓 M5052:31 11. 广州汉墓 M5069:49
12. 象岗南越王墓 C213-2 13. 广州汉墓 M5022:17、M5042:15、M5069:49、M5073:1 (由上至下、由左及右)

图十一 广州地区汉墓出土家禽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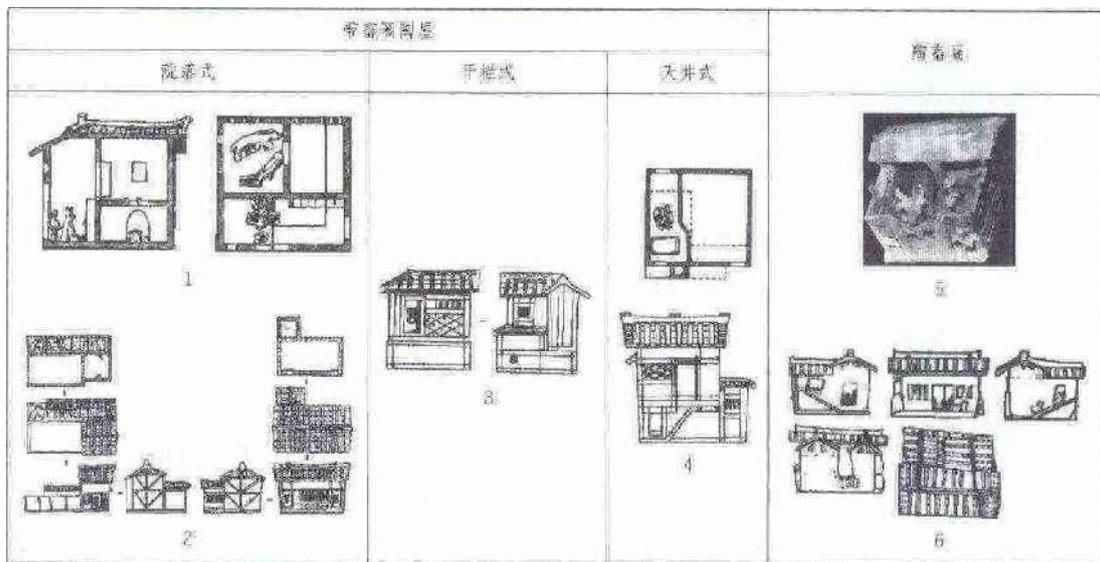
2. 家禽家畜饲养

广州地区东汉墓葬出土的陶屋模型中多见家禽、家畜俑。东汉前期陶屋一般为院落式，由房屋和庭院两部分组成，禽畜一般饲养在后院角落。广州汉墓一些陶屋的后院有陶鸡、陶狗，东汉前期广州汉墓 M4011 陶屋后院中有形态生动的陶猪，或哺乳，或侧卧，与楼上舂米及从事其他农活的人俑构成一组农家生活图景(图十二:1)。广东肇庆康乐中路 M7^[47]陶屋的庭院回廊角落为畜圈，里面有母猪和小猪(图十二:2)。

西汉后期至东汉初期陶屋多为楼阁式。一种为干栏式建筑，上层是房屋，下层饲养家畜，即明代邝露《赤雅》所言“人栖其上，牛羊犬豕畜其下”，例见广州南田路 M4^[48]

(图十二:3)。广东佛山南海 M3^[49] 出土陶屋后室为干栏式，下为猪圈，内有公猪、母猪和小猪俑，猪圈上方为厕所。另一种楼阁式陶屋设天井，牲畜饲养在底层或天井内。如西汉后期广州先烈南路 M5^[50] 陶屋上层的左侧是厕所，下面为猪圈(图十二:4)。东汉后期广州汉墓 M5007 陶屋后排楼阁的底层有鸡、猪俑；佛山澜石东汉墓^[51] 陶屋的前堂内有舂米、宰羊的人俑，天井内为猪栏，有正在喂猪的人俑。

岭南地区汉墓还出土陶畜圈模型。韶关市郊东汉墓^[52] 出土陶猪圈 2 件，围墙上有所水口，中塑一泥狗。广州沙河顶东汉初期墓^[53] 出土 1 件陶牛圈(图十二:5)，悬山顶，前半部是用栅栏围起的开敞空间，圈内有 5 头牛，圈外人俑做门门状。东汉后期广州汉墓 M5070 出土的牛圈平面方形，四周有围墙，圈内有 2 头牛。番禺员岗村东汉墓^[54] 出土羊圈 2 件，进深两间，正屋内的人俑做看门状，内有食槽(图十二:6)。



1. 广州汉墓 M4011:5 2. 肇庆市康乐中路 M7 出土带畜圈陶屋 3. 广州南田路 M4:19
4. 广州先烈南路 M5 出土陶屋 5. 沙河顶东汉墓出土陶牛圈 6. 番禺员岗村 M1:42

图十二 广东汉墓出土陶畜圈模型

(二) 渔猎捕捞

南越国“即使在已开发的地区，除了农业种植，水产捕捞和狩猎也是重要的生活手段”^[55]。广州地区汉代墓葬和遗址中出有大量水产动物遗骸，多盛装在陶罐和铜釜、铜鼎、铜壶、铜提筒等容器内。象岗南越王墓鉴定的水产动物种类占出土动物遗骸的 70% 以上，尤其是海产贝类最多^[56]。有些动物较难捕获，如青蚶需要凿开岩洞用镊子夹取，说明岭南地区汉代居民的捕捞技术已经比较专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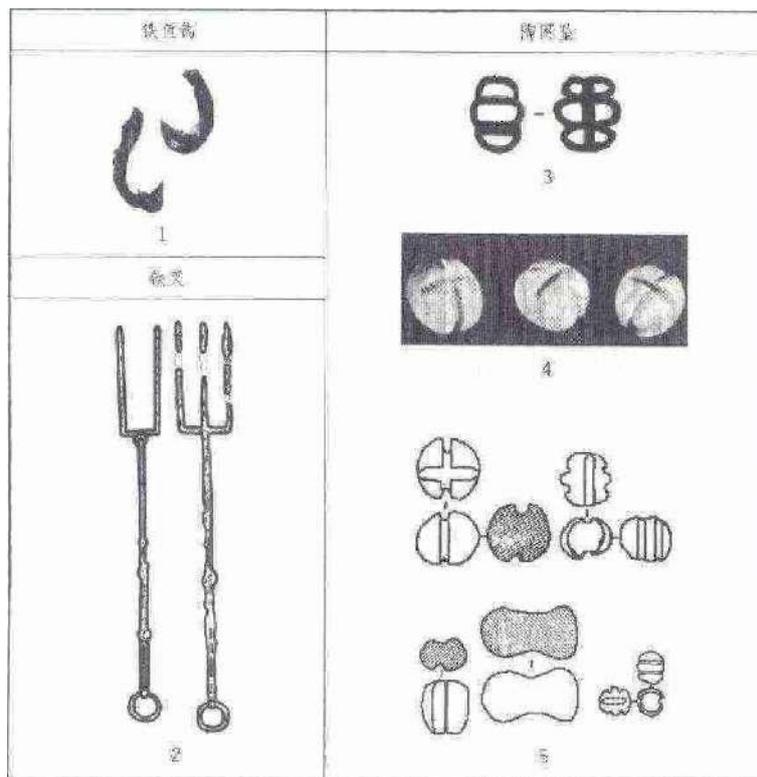
岭南地区出土的汉代渔捞工具有鱼钩、网坠、鱼叉，有些金属镞、锥也可以用于渔猎。

钩是最简单的渔具，三国魏人张揖《广雅·释器》称“钩，钓也”。鱼钩上的倒刺名“𦏧”^[57]，挂绳称为“缙”^[58]，挂绳系在竹、木竿上。岭南地区汉代的鱼钩多为铁

制，如象岗南越王墓西侧室出土铁鱼钩2件，用铁条锻打成弯钩形，无倒刺，其中1件一侧有密排丝线，可能为钓线（图十三:1）。

《淮南子·说林训》云“钩者静之，网者动之”，网鱼效率要高出很多，还可以扩大食物种类，获取贝类等软体动物。象岗南越王墓西耳室出有大、小两种陶网坠620件，均为长椭圆形，有直沟和凹槽，可见绳痕，个别残留朽绳（图十三:2）；南越国宫苑遗址^[59]出土陶网坠12件。西汉后期广州汉墓M3030出土的陶网坠两面有十字形凹槽，用来系绳（图十三:3）；广州海幅寺汉代窑场^[60]出土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后期的陶网坠138件，分为四型（图十三:4）。广州地区出土汉代陶网坠的数量很多，说明当时网鱼捕捞已经普及。

叉鱼也是一种广泛应用的捕鱼方法，岭南地区出土的汉代铁叉有些可能用作渔叉。象岗南越王墓后藏室中见有三股铁叉和双股铁叉各1件，叉杆由几节铁条扭结环扣而成（图十三:5），或许就是渔叉。渔叉古代称为籍，《说文》释“籍，刺也。刺者，直伤也”。《周礼·天官·鳖人》云“鳖人掌取互物，以时籍鱼鳖龟蜃凡狸物”，郑玄注“籍，谓以权刺泥中搏取之”，可见渔叉还可以叉捕泥水中的甲壳类生物。



1. 象岗南越王墓 F95 出土 2. 象岗南越王墓 G59-10、11 3. 象岗南越王墓 C128-1
4. 广州汉墓 M3030:1 5. 广州海幅寺汉代窑场出土

图十三 广州地区出土汉代渔捞工具

岭南地区汉代捕鱼业的发达，与当时造船业的发展有很大关系。岭南地区汉代造船技术已经成熟^[61]，广州等地汉墓出有各种木船模型和陶船模型20余件，包括《广州

汉墓》发表的 15 件（其中西汉木船模型 8 件、东汉木船模型 1 件、东汉陶瓷船模型 6 件），广州皇帝岗西汉墓木船模型 1 件^[62]，广州东郊东汉墓陶船模型 1 件^[63]，广州黄花岗东汉墓陶船模型 1 件^[64]，番禺东汉墓陶船模型 2 件^[65]，肇庆康乐中路 M9 东汉陶船模型 1 件^[66]，广西贵港梁君垌东汉墓陶船模型 1 件^[67]。佛山澜石东汉墓^[68]出土水田模型旁附一陶船，渔夫坐在船头，舱内有 2 条鱼。当时的造船技术不仅可以满足内河航行，还可以将捕鱼范围扩大至近海。

除了捕捞，狩猎在生计方式中也很重要。岭南地区汉代遗址和墓葬出有很多野生动物骨骸，如象岗南越王墓出有 200 多只禾花雀、竹鼠等野生动物，南越王宫苑遗址经鉴定的野生动物有麻雀、豪猪、熊、梅花鹿等。南越王墓后藏室出土的禾花雀“均斩头去爪放入陶罐中”，禾花雀“喜吃灌浆稻谷，是农业的害鸟”，汉代岭南居民大概掌握了禾花雀的习性，“懂得张网捕捉，才能获得如此大量的个体”^[69]。

金属镞、锥可能也用于渔猎捕捞。镞是远兵器，自然可以用来狩猎，岭南地区汉墓中如果仅出有镞而不出其他兵器，或者镞不与其他兵器摆放在一起，即应该考虑其狩猎用途。《淮南子·兵略训》云“疾如锥矢”，锥这种头端锐利可以钻孔的工具方便处理鱼、蚌这类动物。

三、岭南地区汉代居民的庖厨器用

岭南地区汉代居民的食物种类主要有粮食、蔬菜、水果、鱼类动物、甲壳类动物、家禽、家畜和野生爬行类、哺乳类动物等，其中稻米是主粮，鱼、贝类水生动物在饮食结构中占有一定比例，还有石蜜、筍菹（竹笋腌制的酱菜）^[70]等具有岭南特色的副食品。

西汉桓宽《盐铁论·散不足篇》云：“古者粝食藜藿，非乡饮酒、媵腊、祭祀无酒肉。故诸侯无故不杀牛羊，大夫士无故不杀犬豕。今闾巷县伯、阡陌屠沽，无故烹杀，相聚野外，负粟而往，挈肉而归……今熟食遍列，彀施成市。”由于食物种类的丰富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汉代居民的食材加工和烹饪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广州地区汉墓出土的水井模型，以及陶灶等炉具、蒸煮炊具、食材加工用具等，从庖厨器用方面反映了岭南地区汉代居民的生计方式。

（一）陶井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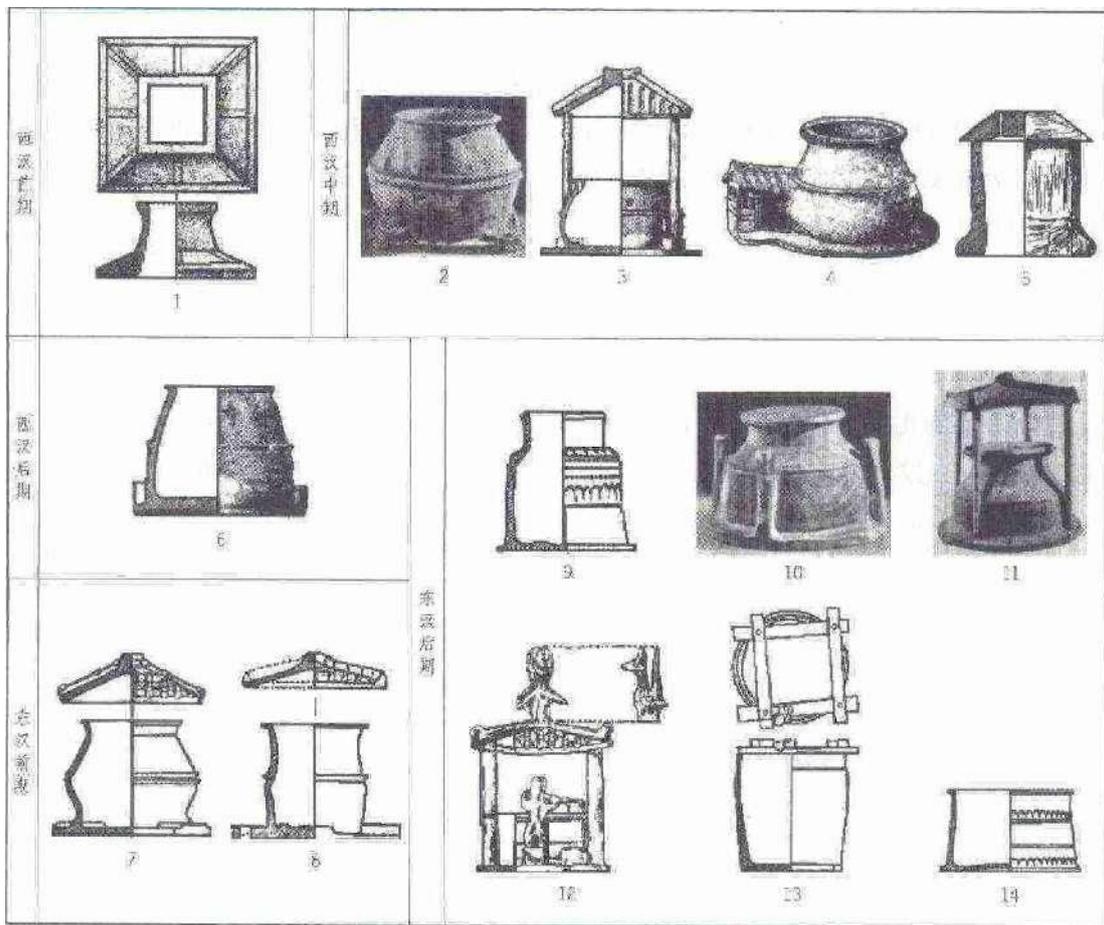
水井用作农业灌溉和日常生活，不过岭南地区没有发现专门用于灌溉的汉代水井。南越王宫苑遗址发现的汉代水井达数百眼，井壁有土、木、砖、瓦片、陶井圈等多种形制，井底发现一些取水时遗落的陶罐。广州地区汉墓出土的一批陶井模型明器，根据井栏、地台、井亭等结构可以分为五型。

A 型陶井以西汉前期广州汉墓 M1174:25 为代表，井栏呈覆斗状、方形地台（图十

四:1)。

B型陶井见于西汉中期广州汉墓 M2051:4, 圆形井栏, 方形地台, 地台上有柱础(图十四:2); 东汉前期的广州汉墓 M4015:51 陶井地台为八面形(图十四:7)。

C型陶井出现井亭, 如西汉中期广州汉墓 M2060:6, 井台圆形, 有4个柱础, 上起井亭(图十四:3); 西汉后期 M3009:29 地台狭窄(图十四:6), 东汉前期 M4019:41 圆形地台, 井亭仅存木架(图十四:8)。东汉后期的井亭上出现陶动物, 如广州汉墓 M5028:4 的亭盖上立一陶猴, M5029:2 的亭盖上立一凤鸟。东汉后期有些陶井的柱础与井沿几乎持平, 如广州汉墓 M5077:15 (图十四:10)。东汉后期增城金兰寺 M2^[71] 出土陶井较完整(图十四:11); 广州汉墓 M5064:3 无井亭, 地台圆窄, 井栏呈罐状(图十四:9)。



1. A型陶井(广州汉墓 M1174:25) 2. B型陶井(广州汉墓 M2051:4) 3. C型陶井(广州汉墓 M2060:6)
 4. 异型陶井(广州汉墓 M2009:1) 5. 木井(广州汉墓 M2050:30) 6. C型陶井(广州汉墓 M3009:29)
 7. B型陶井(广州汉墓 M4015:51) 8. C型陶井(广州汉墓 M4019:41) 9. C型陶井(广州汉墓 M5064:3)
 10. C型陶井(广州汉墓 M5077:15) 11. C型陶井(增城金兰寺 M2:11) 12. D型陶井(广州汉墓 M5046:6)
 13. E型陶井(广州汉墓 M5080:47) 14. 异型陶井(番禺小谷围 M1B:10)

图十四 广州地区汉墓出土陶井、木井

D型陶井主要见于东汉后期, 常附有陶动物俑和人俑。广州汉墓 M5046:6 方形井栏上放置1个汲水斗, 方形地台上放1个水桶, 1个人俑正在提水(图十四:12)。

E型陶井出现于东汉后期，广州汉墓 M5080:47 井栏呈圆筒状，地台呈窄方形，四角有圆孔，井栏上置一井形方架，方架的四角圆孔与地台四孔分别垂直用来装木柱（图十四:13）。

西汉中期广州汉墓 M2009:1 在井栏一侧附有矮屋 1 间，比较特殊（图十四:4）。番禺小谷围东汉后期墓^[72]出土的陶井未见井亭，井栏直壁，有地台（图十四:14）。西汉中期广州汉墓 M2050:30 井栏呈长方形，地台近似椭圆形，由一块整木头挖空制成，有盖（图十四:5）。

（二）陶灶等炉具

广州地区汉墓出土的炉具以模型明器陶灶为最大宗，此外还出有铜炉、陶炉、铁三足架等，与铜炉共出的辅助工具有铁链、铁钎等。

灶是厨事活动中的主要炉具，汉代人很重视。《释名·释宫室》云“灶，造也，创造食物也”，《汉书·五行志》称“灶者，生养之本”。与中原地区不同的是，广州地区汉墓出土的陶灶上除了放置陶釜、陶甑，还放置陶锅、汤缶等。根据灶台形状及水缸等附件可以将陶灶分为五型。

西汉前期的 A 型陶灶较短、较矮，平面呈三角形，前部较尖圆；B 型灶如广州汉墓 M1174:24，灶台较短矮，平面近方形，上置两釜一甑，灶门呈券拱形（图十五:1）。西汉中期的 B 型灶平面略呈长方形，灶门为梯形，广州汉墓 M2010:2 下连地台，开 2 个火眼（图十五:2）；M2060:5 地台较短，开 3 个火眼（图十五: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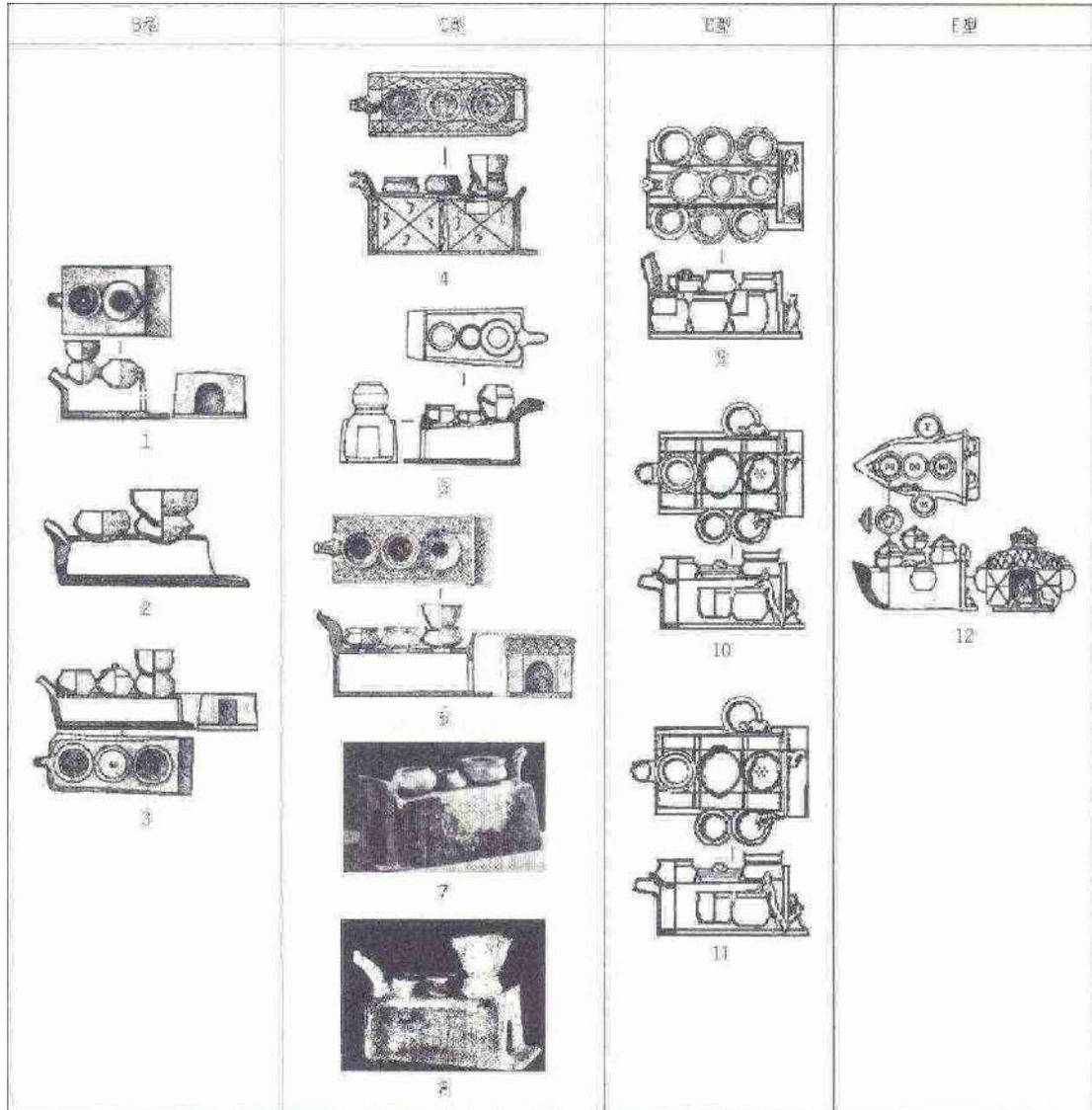
西汉中期出现 C 型灶，灶台平面略呈长方形，有额墙，烟囱为龙首状。如广州汉墓 M2051:2，灶台两壁各刻划一狗、一猫，开 3 个火眼（图十五:4）；又如广州永福路 M2^[73]陶灶（图十五:5）。C 型灶亦见于西汉后期，形制与西汉中期基本相同，如广州汉墓 M3031:22（图十五:6），广东南海 M4^[74]陶灶的地台较短（图十五:8）。

C 型灶流行至东汉，如东汉前期广州汉墓 M4013:戊 21（图十五:7）。东汉前期广州汉墓的 C 型灶更加写实，有些陶灶的前方地台上有烧火俑，如 M4020:30；M4016:50 灶台左壁刻划游龙 3 条、奔牛 1 头，灶门旁刻划一狗。东汉前期 C 型灶中有些烟囱比较特别，灶门前的地台上有烧火俑和猫、狗俑，如 M4036:25 烟囱为扁长方形，另附透烟孔；M4029:19 灶台前宽后窄，无烟囱，仅在后壁开一透烟孔。这类烟囱比较特别的 C 型陶灶在广州汉墓中沿用至东汉后期。

东汉后期广州汉墓的陶灶形制有较大变化，出现 D 型灶，灶台两壁附有数目不等的水缸，几乎每件陶灶的地台上都有烧火俑和猫俑、狗俑，灶面上放置釜、甑、锅。D 型灶烟囱形制多样，如 M5010:48 烟囱为龙首形（图十五:9）；M5070:36 烟囱为扁长方形，其下附透烟孔（图十五:10）；M5041:18 烟囱为圆筒形（图十五:11）。D 型灶有的

无烟囱，仅在灶后上端开一透烟孔。

东汉后期还出现E型灶。以广州汉墓 M5080:58 为例，灶台平面呈三角形，前端翘起，略似船状；开3个火眼，分置釜、釜甑和锅，锅内烹煮甲鱼；灶壁左右各附一水缸，旁有舀水俑；地台上有烧火俑和狗俑，灶面和额墙上有鼠俑（图十五: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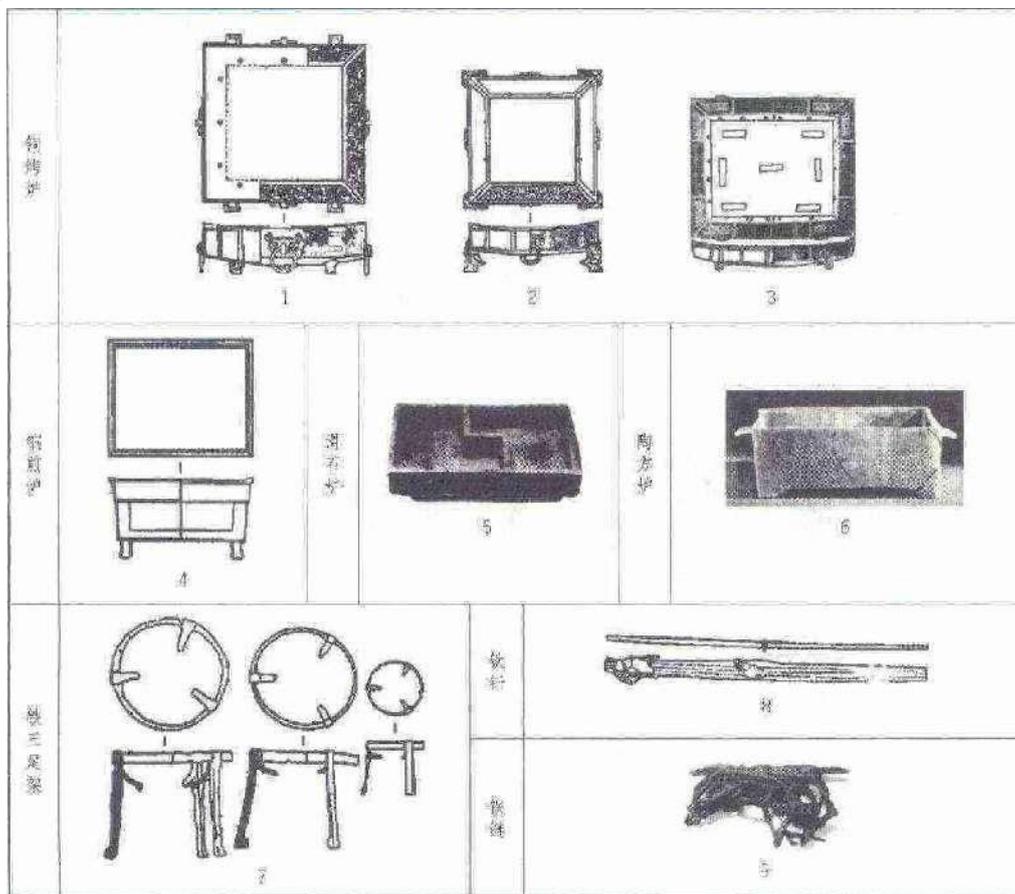
1. 广州汉墓 M1174:24 2. 广州汉墓 M2010:2 3. 广州汉墓 M2060:5 4. 广州汉墓 2051:2
 5. 广州永福路 M2:59 6. 广州汉墓 M3031:22 7. 广州汉墓 M4013:戊 21 8. 南海 M4 出土
 9. 广州汉墓 M5010:48 10. 广州汉墓 M5070:36 11. 广州汉墓 M5041:18 12. 广州汉墓 M5080:58

图十五 广州地区汉墓出土陶灶

除了陶灶，广州地区汉墓还出有铜烤炉、铜煎炉、滑石炉、陶方炉、铁三足架等炉具。

铜烤炉见于象岗南越王墓西耳室，方体，宽平沿，直壁，壁附衔环，底部略凹圆，四蹄足，适合煎烤肉食（C53，图十六:1）。南越王墓后藏室出有铜烤炉 2 件（G40、G41），叠置，推测原来有木架，均为方体，四角微翘，分别有鴉足或轮足，壁有铺首环耳（图

十六:2、3)。铁链、铁钎为烧烤辅助用具，西耳室出土的铁钎为圆锥状，6件一捆（C48，图十六:8）；后藏室出土的铁链（G40-1，图十六:9）、铁钎装在竹筍筐内放置在铜烤炉（C40）上方，铁链2套用来钩挂烤炉的铺首环耳防止烫手，铁钎4组用来串烤食物。



1. 象岗南越王墓 C53 2. 象岗南越王墓 G40 3. 象岗南越王墓 G41 4. 象岗南越王墓 G11
5. 象岗南越王墓 G12 6. 广州汉墓 M4014:52 7. 象岗南越王墓 G59-1、2、4
8. 象岗南越王墓 C48 9. 象岗南越王墓 G40-1

图十六 广州地区汉墓出土炉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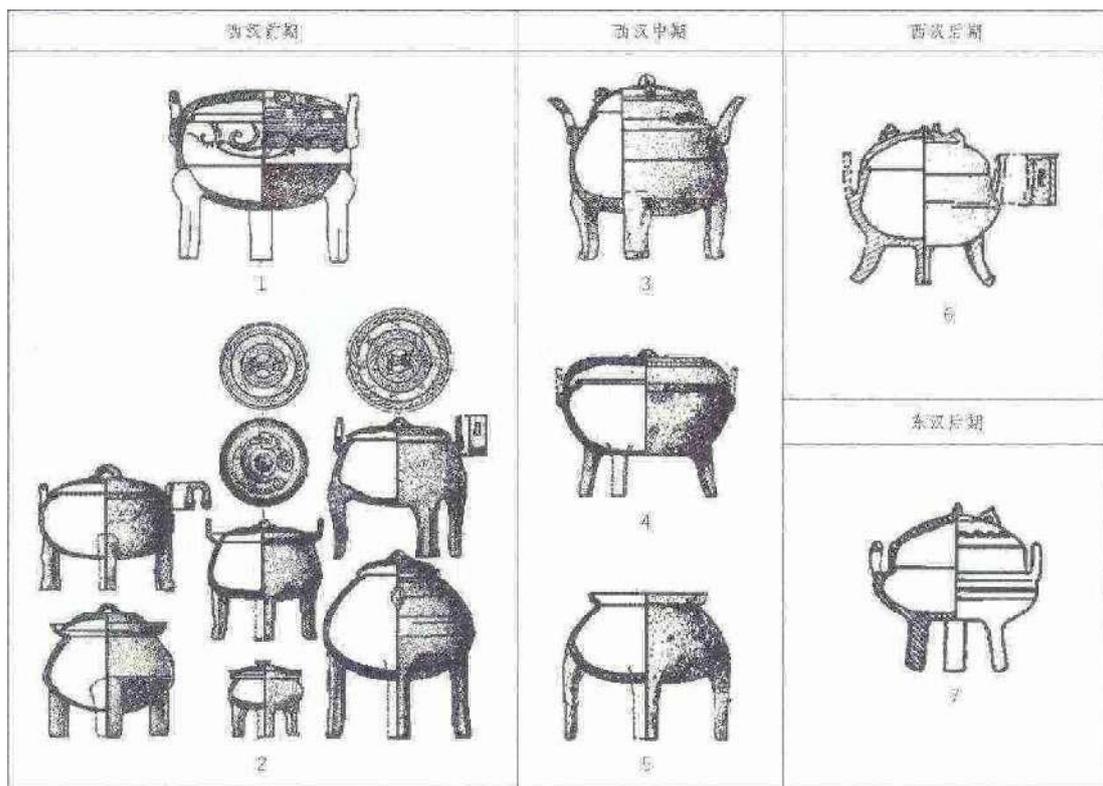
象岗南越王墓后藏室出土1件铜煎炉(G11)，分为上、下两层，方盘状，上层四角微翘，下层平直，四矮足，底部有烟灸（图十六:4）。南越王后藏室还出土1件滑石炉(G12)，平面长方形，直壁，炉内间隔成曲尺状，平底四足，有烟灸痕迹，形似鸳鸯火锅（图十六:5）。东汉前期广州汉墓 M4014 出土的陶方炉两侧有鸟喙状螯耳，四短足（图十六:6）。

出土的铁三足架大小不一，代表器物为南越王墓后藏室出土的3件(G59-1、G59-2、G59-4，图十六:7)，均用一条扁平铁片围成圆箍状，三足各用一段铁条或铁片制成，其上半段锤锻成片，扭折后卡扣在圆箍上并折向中心，以承架釜等蒸煮器。三足架正名为炆，《说文》释“炆，行灶也”。

(三) 蒸煮炊具

岭南地区汉代居民主要使用平底或圜底的釜、釜、甑、锅等蒸煮容器，甗等三足炊器不发达，不过鼎在西汉尤其是西汉前、中期仍然常见。鼎是盛煮食器，可以用作礼器。《说文》释“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南朝梁人顾野王《玉篇》云“鼎，所以熟食器也”。鼎用作礼器时一般盛放肉食，即礼制规定的“七羹”。《周礼·天官·膳夫》记“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郑注“鼎有十二，牢鼎九，陪鼎三”。

岭南汉墓出土的陶鼎分为汉式鼎和越式鼎两类。汉式鼎一般用作礼器，如广州象岗南越王墓东侧室 E13 (图十七:1)；越式鼎为实用器，往往有烟炷痕迹。西汉前期广州汉墓出土一批越式或融有越式风格的陶鼎 (图十七:2)。西汉中期陶鼎以广州淘金坑汉墓^[75]为例，其中 1 件汉式鼎与中原地区形制差异较大 (图十七:3)，1 件显示出汉、越融合的形制特征 (图十七:4)，1 件为越式鼎 (图十七:5)，制作均较粗糙。西汉后期广东南海 M4^[76]、佛山澜石东汉墓^[77]出土的陶鼎 (M4:28) 仍然有越式鼎遗风 (图十七: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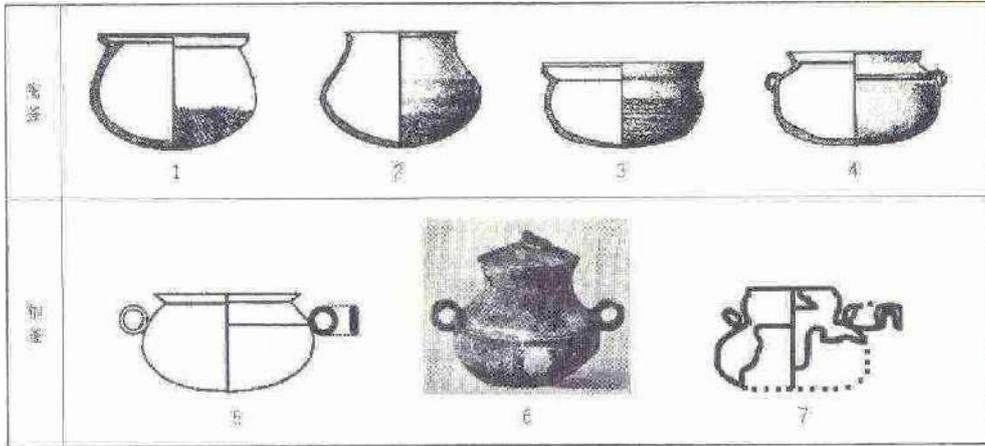


1. 象岗南越王墓 E13 2. 广州汉墓 3. 广州淘金坑 M21:7 4. 广州淘金坑 M7:5 5. 广州淘金坑 M25:7
6. 南海 M4 7. 佛山市郊澜石 M4:28

图十七 广州地区汉墓出土陶鼎

岭南地区汉代居民的蒸煮容器主要有釜、釜、锅等，甗经常与这些容器成套出土。釜是汉代主要蒸煮容器，最简单的用法是以三脚架 (即“炷”) 将其支起，下面燃火。《尔雅》孔颖达疏“炷者，无釜之灶，其上燃火，谓之烘”，方便移动炊煮。釜有

时与甑搭配成“釜甑”来蒸饭。广州地区汉墓常见陶釜和铜釜（图十八），西汉前期均为圜底。西汉前期见有编索形环耳铜釜，如广州汉墓 M1175:65（图十八:5），出土时尚有一些鱼骨；广州汉墓 M1180:47（图十八:6），有盖。此期还出有葫芦形铜釜，如广州汉墓 M1149:25（图十八:7）。出土陶釜、铜釜的底部几乎均有烟炱痕迹，为实用器。



1. 象岗南越王墓 E15 2. 广州汉墓 M1077:7 3. 广州汉墓 M1116:6 4. 广州汉墓 M1150:32
5. 广州汉墓 M1175:65 6. 广州汉墓 M1180:47 7. 广州汉墓 M1149:25

图十八 广州地区汉墓出土陶釜、铜釜

西汉后期以来三足陶釜（图十九）数量增多，东汉后期三足陶釜的柄部较平直，腹部趋于扁平。西汉中期至东汉时期三足铜釜均较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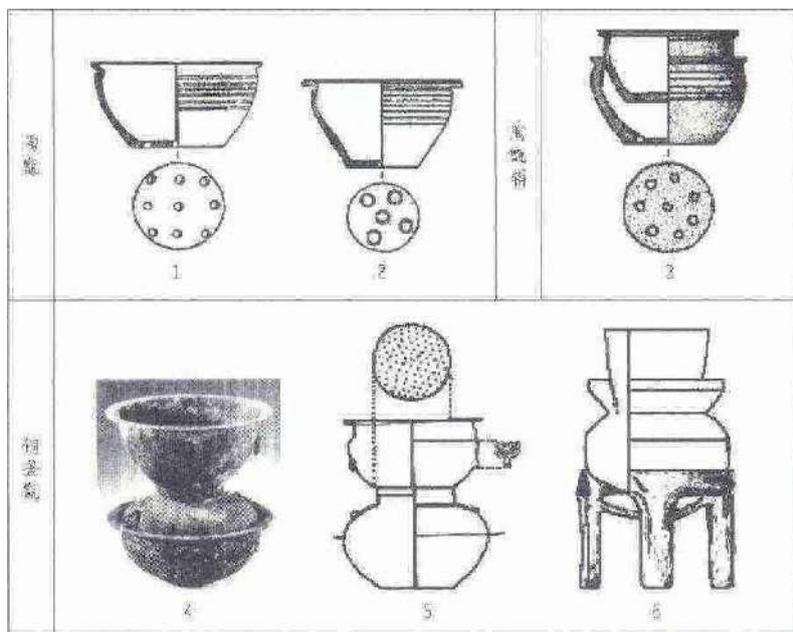


1. 广州汉墓 M3023:14 2. 南海 M4 3. 广州汉墓 M4039:33 4. 广州汉墓 M4003:13
5. 广州汉墓 M4008:10 6. 广州汉墓 M5069:22 7. 广州汉墓 M5041:11 8. 佛山澜石 M2:4

图十九 广州地区汉墓出土陶三足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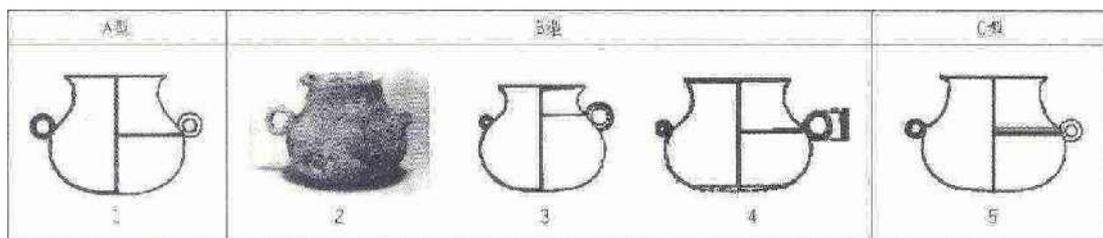
陶甑是广州地区汉代蒸煮容器中的大宗。象岗南越王墓出有两种形制的陶甑（图二十:1、2）。甑一般与釜结合使用，如南越王墓后藏室出土的铜釜甑（G70，图二十:4），以及广州汉墓西汉前期 M1172:17、东汉后期 M5036:15 两件铜釜甑，前者下面还套着铜

铜（图二十:5），后者套在铁三足架上（图二十:6）。除了釜甑，蒸煮容器还有叠放在一起的甑铜，西汉前期广州汉墓有33座出有陶甑锅（图二十:3），有的近旁还有成堆木屑或炭屑，广州淘金坑西汉墓^[78]出土甑铜7套。汉代鬲、甑合体的赢还有一定数量，如广州汉墓西汉前期出有陶甑（如M1176:20）、铜甑（如M1174:42），西汉中期出有陶甑8件（如M2050:25），西汉后期出有陶甑15件（如M3025:23），东汉少见。



1. 象岗南越王墓 E72 2. 象岗南越王墓 E3 3. 广州汉墓 M1178:19
4. 象岗南越王墓 G70 5. 广州汉墓 M1172:17 6. 广州汉墓 M5036:15

图二十 广州地区汉墓出土的铜甑、铜甑铜、铜釜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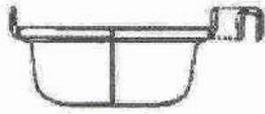
1. 象岗南越王墓 C5 2. 象岗南越王墓 E66 3. 象岗南越王墓 G6 4. 广州汉墓 1121:2 5. 象岗南越王墓 G63

图二十一 广州地区汉墓出土铜釜

釜与釜形制相似，《广雅》称“釜，釜也”，颜师古注西汉《急就篇》云“釜似釜而反唇。一曰釜者，小釜类也，即今之所谓锅”，也可以承甑。岭南地区汉墓出土铜釜的形制与釜相近，多为编索纹环耳，分为三型。A型以广州象岗南越王墓西耳室 C5 为例，溜肩，编索纹对称环耳（图二十一:1）；B型溜肩，环耳大小不一，器底见有烟炱痕，象岗南越王墓东耳室 1 件，后藏室 2 件（图二十一:2、3），西汉前期广州汉墓 M1121:2 与其相似（图二十一:4）；C型以南越王墓后藏室 G63 为例，折肩，环耳一大一小（图二十一:5），广州淘金坑西汉中期墓出有此型铜釜 3 件^[79]。广西贵县罗泊湾 1 号墓出土铜釜的腹部有柄，《从器志》称为“温釜”，用作加热器。铜釜是蒸煮实用器，南越王

墓东侧室 E66 出土时内有猪骨、鸡骨、鱼骨、蛋壳等食物残骸，西汉前期广州汉墓出土铜釜往往与鼎、盆等放置一起，出土时内有鱼骨、鸡骨，有的放铜勺，底部有很厚的烟炱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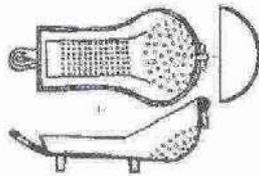
锅也是炊煮容器，《正字通》云“俗称釜为锅”。东汉后期广州汉墓出有铜锅，见于 M5036:14（图二十二）。



图二十二 广州汉墓出土铜锅

（四）食材加工用具

岭南地区汉代的食材加工用具有铁刀、姜礮等。铁刀用途广泛，在广州地区汉墓中经常见到，不过专门用于食材加工的铁刀并无确证。《玉篇》释“礮”为“粗石也”，是一种菜蔬搓丝工具，姜礮就是将姜块搓丝漏汁的工具。广州象岗南越王墓西耳室出土的铜姜礮(C70)匙形，柱状短足，前、后两端有环耳，凹槽上有许多用来搓擦姜块的小乳钉，勺部有数十个小漏孔（图二十三）；后藏室出土的一件铜姜礮(G32-2)与前者形制相似，放在铜鼎内。



图二十三 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铜姜礮

四、岭南地区汉代居民的饮食器具

《盐铁论·散不足篇》称“今民间酒食，穀旅重叠，燔炙满案”，汉代居民的饮食生活殊为丰富，这在汉墓壁画的庖厨宴飨图像中多有表现，汉墓中出土的饮食器具也足以说明岁时食俗和祭祀食俗就更加隆重。岭南地区汉代居民的饮食习俗有其地域特色，比如汉墓中出土水果残骸的比率高于中原地区，经鉴定的水果种类以橄榄、荔枝、杨梅等为主。具有地域特色的饮食器具也能够从某些角度反映岭南地区汉代居民的生计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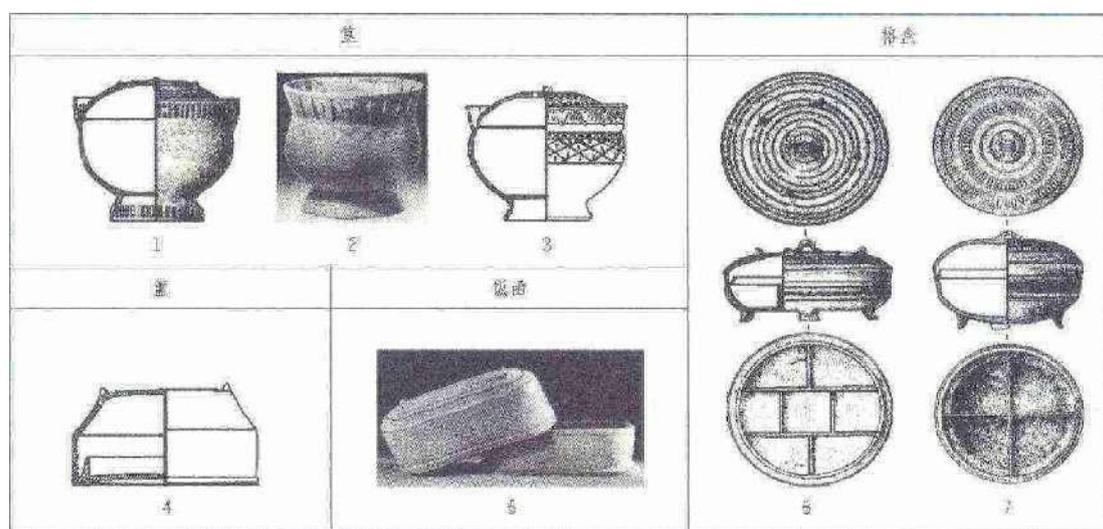
（一）盛食器具

岭南地区汉代盛放、贮存食物的器具种类繁多，包括鼎、簋、镬、盒、簠、瓮、罐、碗、钵、盘等。比较具有地方特色的盛食器具有簋、格盒、联罐等。

簋一般与鼎配套出现，是盛放黍稻等饭食的用具，可以用作礼器。广州地区汉墓出土的陶簋出现于西汉后期，其形制最具地方特色之处是有着高敞外撇的唇沿，唇沿

上多饰有镂孔。西汉后期广州汉墓 M3031 出土的陶簋侈口、深腹、圈足（图二十四:1），M3028 出土的陶簋鼓腹（图二十四:2），东汉时期陶簋纹饰更加繁缛，如广州汉墓 5060:17（图二十四:3）。

簋与簠功用相似，也是宴飨或祭祀时盛放稻黍饭食的容器，只是形制有别。《周礼》记“凡祭祀共簠簋”，郑注“方曰簠，圆曰簋，盛黍、稻、稷、粱器”。东汉后期广州黄花岗 M3^[80] 出土的陶簠长方形，平底（图二十四:4）。东汉后期广州汉墓 M5049、M5080 出有陶饭函，分别为长方形和圆角长方形，平底（图二十四:5）。不过从形制上看，这些称为陶簠、陶饭函的器物均有几近底部的套盖，与奩很相似，当然一器多用的可能性也存在。陶格盒用来盛放各种果品。西汉早期广州汉墓 M1180:29 分为七格（图二十四:6），有釉，敛口，浅圆腹，平底，三短足，半环钮盖，纹饰精细；M1139:22 敛口，深圆腹，圜底，分成四格（图二十四: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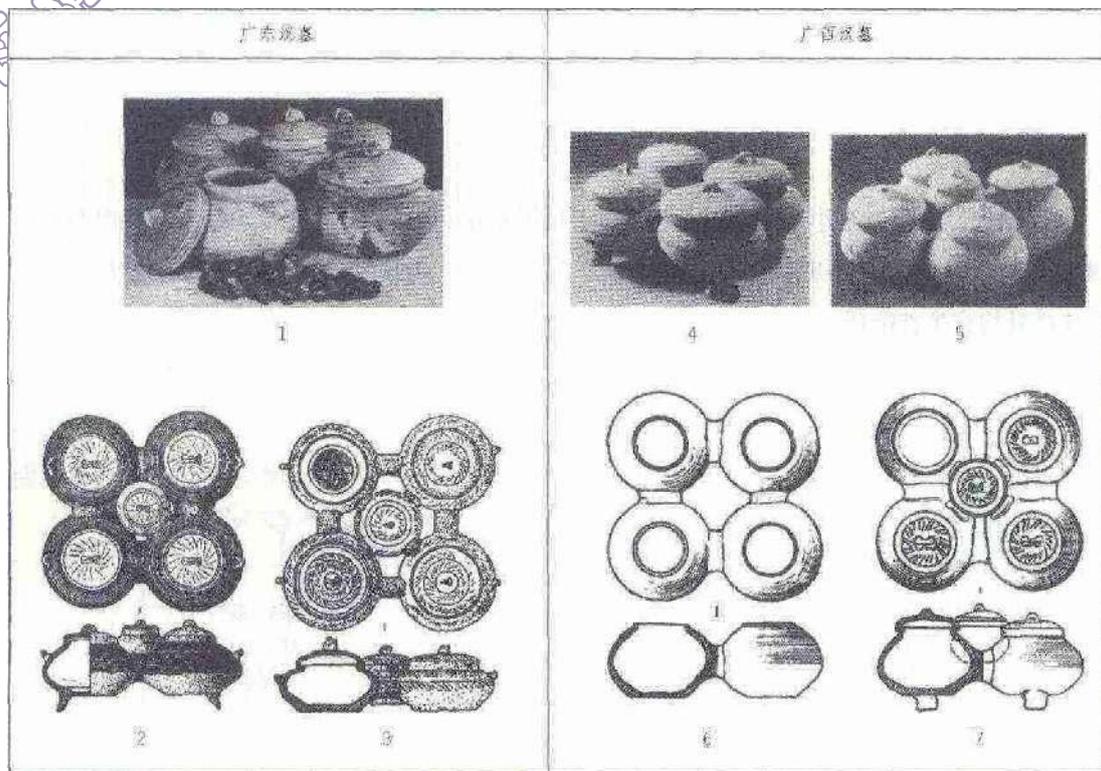
1. 广州汉墓 M3031:42 2. 广州汉墓 M3028:15 3. 广州汉墓 M5060:17 4. 广州黄花岗 M3:53
5. 广州汉墓 M5080:89 6. 广州汉墓 M1180:29 7. 广州汉墓 M1139:22

图二十四 广州地区汉墓出土陶簋、陶簠、陶饭函、陶格盒

陶瓮是岭南地区汉墓中的常见器物，《急就篇》谓瓮是盛酒浆米粟之器。瓮也作甕，《仪礼》郑注“甕，瓦器，其容一斛”；也是水器，《说文》释“甕，汲甝也”。广州汉墓出土陶瓮有的盛放食物，如西汉前期 M1172:22 陶瓮中有鸡骨。陶罐在岭南地区汉墓中最常见，包括双耳罐、四耳罐、六耳罐等形制。罐用途多样，所以《说文》仅称其为“器也”，西汉中期广州汉墓 M2050、M2060 出土的四耳陶罐中出有橄榄、酸枣和梅子，还发现鱼骨、牲骨等。

联罐是岭南地区很有特色的陶器，仅见于西汉时期，以五联罐数量最多，西汉早期还出有双联、三联、四联罐，用来贮放果品。广州汉墓的五联罐一般放置在随葬器物的后端，西汉前期 M1170:1 内装有层叠的植物叶子，西汉中期 M2060:24（图二十五:1）尚存李核数十枚。此外，广州淘金坑^[81]（图二十五:2、3）、广西平乐银山岭^[82]（图二

十五:4、5)、广西合浦文昌塔^[83] (图二十五:6、7)等地西汉墓也出有四联罐、五联罐,年代相当于南越国时期。



1. 广州汉墓 M2060:24 2. 广州淘金坑 M23:13 3. 广州淘金坑 M8:22 4. 平乐银山岭 H51:8
5. 平乐银山岭 M117:10 6. 合浦文昌塔 M190:11 7. 合浦文昌塔 M16:6

图二十五 岭南汉墓出土陶四联罐、陶五联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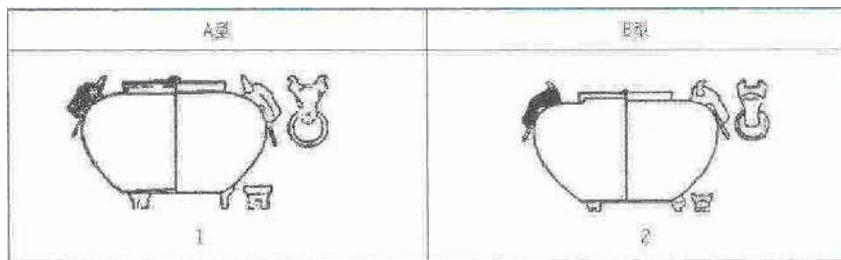
(二) 特色酒器

汉代岭南地区的农业进步使得粮食产量提高,推进了酿酒业的发展,岭南地区汉墓出土遗物中的酒器比例接近一半,种类有壶、钫、尊、耳杯、卮、蒜头瓶、甗、提筒等。据介绍^[84],广西发掘的2000余座汉墓几乎均有酒器陪葬,包括盛酒器、温酒器、舀酒器、饮酒器等,有铜、漆、陶、木、玉、玻璃等质地,其中合浦丰门岭(即风门岭)M10^[85]出土的提梁壶中盛有液体酒,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从器志》列有“厨酒十三缶”,贵县新村22号东汉墓出土的陶灶台表现有酿酒情景^[86]。

壶是岭南地区汉代常见酒器,《周礼》谓“壶,酒器也”。广州汉墓出土陶壶有些在颈部附瓦筒形鼻穿,或者圈足处有镂孔,便于穿绳固定壶盖和提携。壶中较特别的是匏壶,以形似匏瓜而得名,《盐铁论·散不足篇》称“庶人器用即竹柳陶匏而已”。甗、提筒也是汉代岭南地区有特色的越式酒器,提筒和匏壶为一套酒器组合,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尊和壶。甗是盛贮器具,颜注《汉书·扬雄传》曰“甗,小罍也。又铜甗,以盛醯醢羹酱”。岭南地区的铜甗、陶甗主要流行于西汉时期,尤其是西汉前期。

铜甗分为两型。A型斜肩,如广州象岗南越王墓东耳室B66(图二十六:1)和西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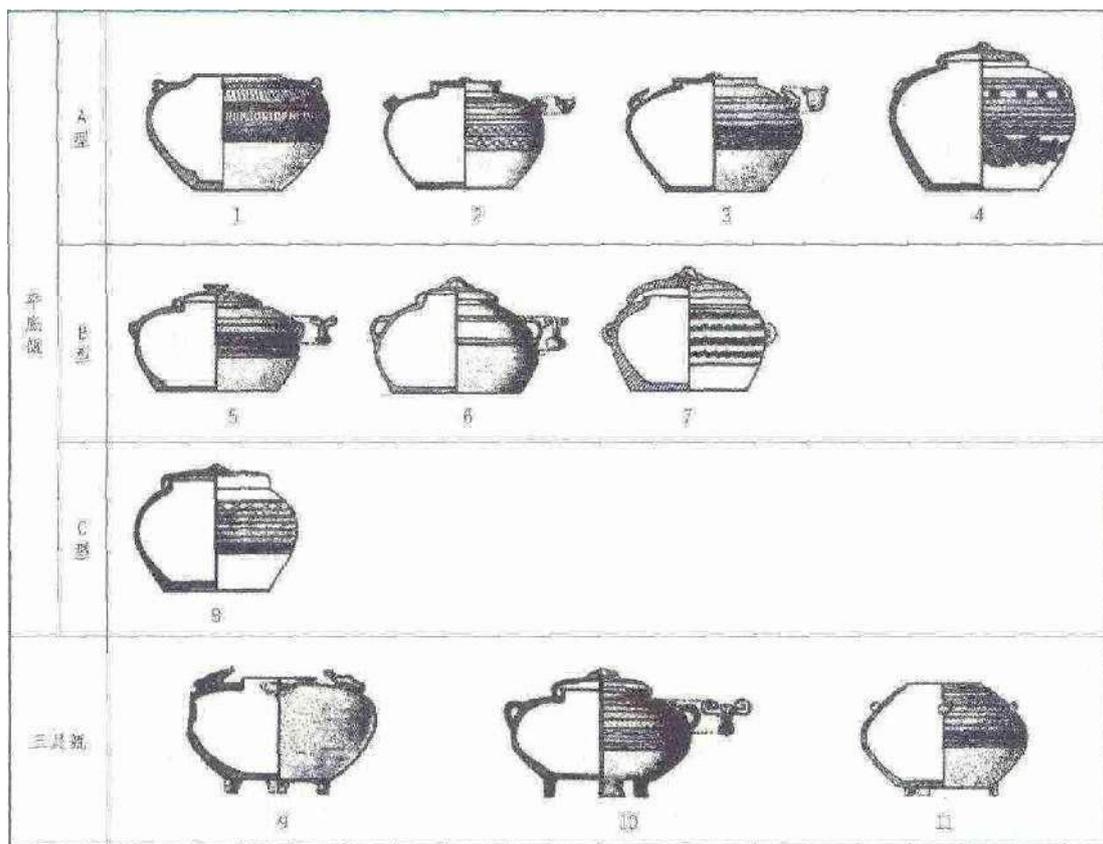
前期广州汉墓 M1170:16。B 型平肩，代表器为象岗南越王墓东耳室 B29（图二十六:2）。两型铜甗的肩腹连接处均有牛首衔环。



1. 象岗南越王墓 B66 2. 象岗南越王墓 B29

图二十六 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的铜甗

广州地区汉墓出土陶甗数量很多，器内均无贮放物品的痕迹，应该是用来盛贮酒浆。多数陶甗施釉，釉层很薄，制作精细，纹饰较为繁缛，有的使用木盖；耳部形态多样，见有横形耳、竖环耳、羊角形竖耳、牛首形卧耳、泥条附耳、鹿头形衔环卧耳、衔环铺首等。西汉前期广州汉墓还出有数量较多的小陶甗。



1. 广州汉墓 M1125:5 2. 广州汉墓 M1085:5 3. 广州淘金坑 M19:12 4. 象岗南越王墓 C42
5. 广州汉墓 M1043:9 6. 广州汉墓 M2061:54 7. 象岗南越王墓 E37 8. 象岗南越王墓 D8
9. 广州汉墓 M1066:40 10. 广州汉墓 M1009:1 11. 广州淘金坑 M2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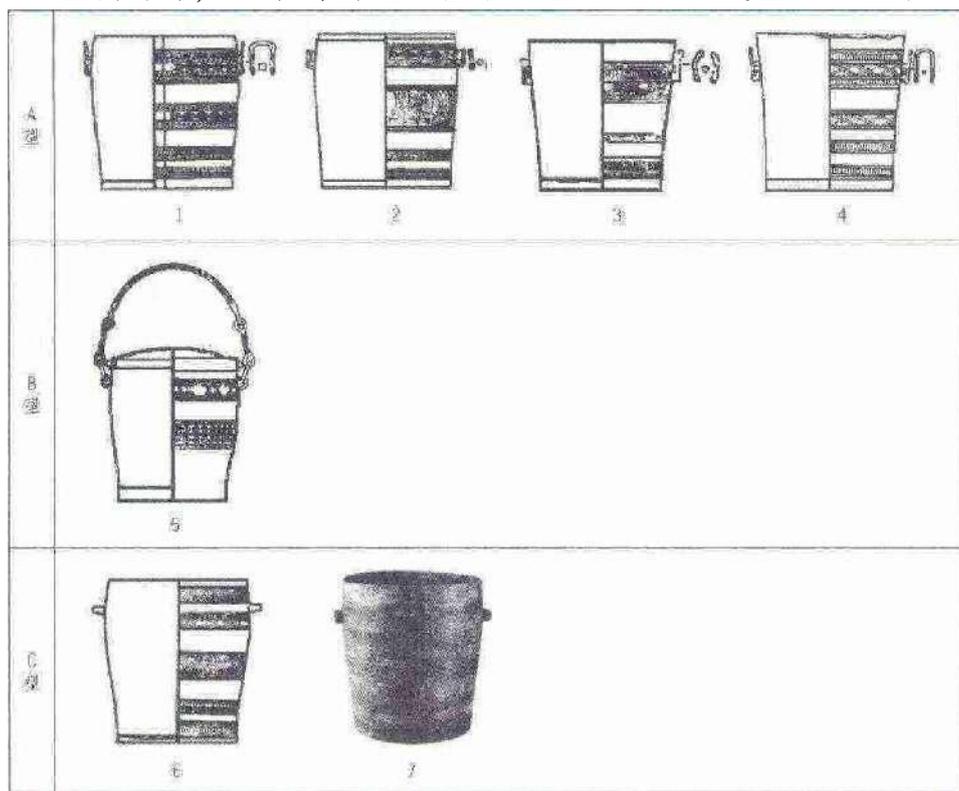
图二十七 广州地区汉墓出土陶甗

平底陶甗数量最多，见有横形耳、竖环耳、羊角形竖耳、牛首形卧耳、泥条附耳

等,分为三型。A型耳部在肩上,收腹较剧,底部相对较小,如西汉前期广州汉墓 M1125:5、M1085:5、广州淘金坑[87]M19:12 和象岗南越王墓西耳室 G42、G264 (图二十七:1~4)。B型耳部在肩腹连接处,收腹较缓,底部相对较大,如广州汉墓西汉前期 M1043:9、西汉中期 M2061:54 和象岗南越王墓东侧室 E37 (图二十七:5~7)。C型陶甑无耳,如象岗南越王墓主棺室 D8 (图二十七:8)。三足陶甑较少,如西汉前期广州汉墓 M1066:40、M1009:1 和广州淘金坑 M25:2 (图二十七:9~11)。

提筒在岭南地区汉墓中一直流行,主要用于贮藏酒浆。东汉前期广州汉墓 M4013:戊3 出土时装有高粱(图二十九:8),器盖内墨书“藏酒十石令兴寿至三百岁”。象岗南越王墓出土铜提筒 G37 内见有黄牛、鸡、猪骨骼和花龟、青蚶、龟足残骸,说明也可以用作盛食器。

铜提筒均有圈足,分为三型。A型附立耳,南越王墓东耳室出土的3件(B57-B59)筒壁上部微鼓(图二十八:1、2),象岗南越王墓后藏室 G37 和西汉前期广州汉墓 M1097:28 筒壁较斜直(图二十八:3、4)。B型竖环耳,如象岗南越王墓西耳室 C61,有提梁(图二十八:5)。C型横桥耳,如象岗南越王墓东侧室 E78 和后藏室 G47 (图二十八: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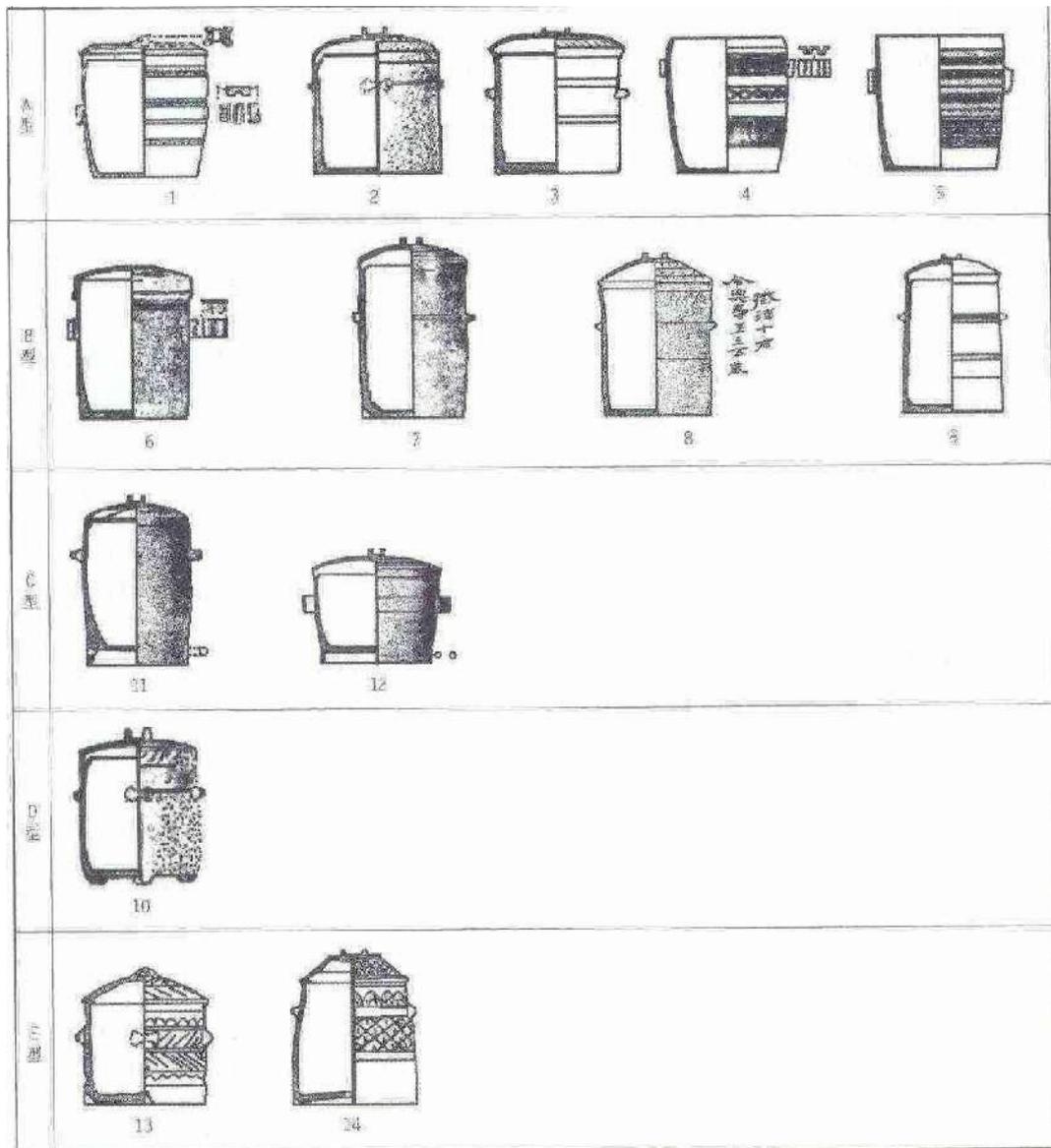


1. 象岗南越王墓 B58 2. 象岗南越王墓 859 3. 象岗南越王墓 G37 4. 广州汉墓 M1097:28
5. 象岗南越王墓 C61 6. 象岗南越王墓 E78 7. 象岗南越王墓 G47

图二十八 广州地区汉墓出土铜提筒

陶提筒分为五型,横桥耳、贯状耳和圈足上的穿孔是为了系挂绳索。A型筒体较宽矮,平底,广州汉墓 M1181:49 (图二十九:1)、M3024:40 (图二十九:2) 和 M4001:43

(图二十九:3) 分别代表了西汉前期、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的形制, 还包括象岗南越王墓西耳室 C88 (图二十九:4)、C89 (图二十九:5)。B 型筒体较窄高, 平底, 以广州汉墓西汉前期 M1180:50 (图二十九:6)、西汉中期 M2038:15 (图二十九:7)、东汉前期 M4013: 戊 3 (图二十九:8) 和西汉后期广州先烈南路 M5:23[88] 为代表 (图二十九:9)。其他三型陶提筒数量较少, C 型圈足, 如广州汉墓西汉中期墓 M2011:41 (图二十九:11) 和 M2060:29 (图二十九:12); D 型三短足, 如广州汉墓西汉后期墓 M3024:42 (图二十九:10); E 型凹底, 如广州汉墓东汉后期墓 M5073:18 (图二十九:13) 和 M5052:25 (图二十九:14)。



1. 广州汉墓 M1181:49 2. 广州汉墓 M3024:40 3. 广州汉墓 M4001:43 4. 象岗南越王墓 C88
 5. 象岗南越王墓 C89 6. 广州汉墓 M1180:50 7. 广州汉墓 M2038:15 8. 广州汉墓 M4013: 戊 3
 9. 广州先烈南路 M5:23 10. 广州汉墓 M3024:42 11. 广州汉墓 M2011:41 12. 广州汉墓 M2060:29
 13. 广州汉墓 M5073:18 14. 广州汉墓 M5052:25

图二十九 广州地区汉墓出土的陶提筒

（三）餐具

餐具主要有勺、箸。勺也用来酌酒，《仪礼》郑注“勺，尊斗也，所以酌酒也”。岭南地区又有陶匏勺，如西汉中期广州汉墓 M2048:38，形似烟斗，勺体呈球形。箸就是筷子，广州东郊沙河东汉初期墓出土铜箸 2 双^[89]，东汉后期广州汉墓 M5054 的 2 双铜箸与铜耳杯放置在铜案上，M5064 也出有 1 双铜箸；广州南田路东汉墓^[90]出土陶箸 1 双。

五、余论

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为南越国都城和秦汉南海郡治番禺所在，墓葬和遗址的出土文物极大程度反映了岭南地区汉代居民的生计方式，从中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汉代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这些出土文物不但显现出岭南地区汉代居民在农业、渔猎捕捞、家畜饲养、饮食庖厨等方面对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的适应和利用，也显现在秦汉郡县设置背景下岭南地区汉、越文化交融的历史轨迹。

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铁锛、锄、耬、杵、白、镰、铲、刀等农业工具和网坠、渔叉等渔猎工具，见有铜烤炉、铁三足架等富有地域特色的饮食加工器具，甗、提筒等越式酒器和壶、耳杯等中原式酒器共出，并发现大量动物遗骸。象岗南越王墓出土文物是珠三角地区西汉前期居民生计方式的最集中体现，代表着南越国时期岭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成就。

广州地区汉墓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陶仓陶井等模型明器、家禽家畜俑、陶灶等炉具、各类蒸煮饮具和特色盛食器、特色酒器等，从西汉前期延续至东汉后期，全面反映了珠三角地区汉代中下层官吏及富裕平民的日常生计方式。这些文物不仅表现出中原文化对岭南地区的影响以及两者的融合，还表现出秦汉时期岭南地区不断得以开发、经济社会日益繁荣的历史过程。

岭南地区背山面海、江河纵横，农业区主要集中在山间盆地、河流冲积平原及河口三角洲，各地居民的生计方式亦各具特色。如汉代合浦“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趾比境，常通商贩，贸余粮食”^[91]，岭南地区汉代可能存在山林狩猎、河谷渔捞、山林刀耕火种、山地耕牧、山地耕猎、丘陵耕作、平原集约农耕等多种经济文化类型。就岭南各地汉墓出土的能够反映生计方式的文物而言，可以见到它们在种类、数量、形制、材质等方面存在的地域特点和时代特征，有必要、也有可能加以更深入研究。

- [1] 周大鸣:《文化人类学概论》,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9, 第 103、105 页。
- [2]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上)》, 文物出版社, 1991, 第 328-349 页。
- [3] 胡守为:《岭南古史》,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 [4] 张荣芳、黄森章:《南越国史》,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 [5] 陈国强、蒋炳钊、吴绵吉等:《百越民族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 [6] 蒋炳钊、吴绵吉、辛土成:《百越民族文化》, 学林出版社, 1988。
- [7] 蒋廷瑜:《广西汉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1 年第 2 期; 覃彩鉴、覃圣敏、蓝日勇等:《从考古资料看汉初南越国的农业》,《农业考古》1985 年第 1 期; 陈伟明:《汉初南越国农业生产述评》,《广西民族研究》1989 年第 3 期; 杨式挺:《广东农业考古概述》, 载《岭南文物考古论集续集》, 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1, 第 253-276 页; 徐恒彬:《汉代广东农业生产初探》, 载《华南考古论集》, 科学出版社, 2001, 第 151-156 页。
- [8] 黄杰玲:《象岗南越王墓动物食品初探》,《广州文博》1985 年第 1、2 期合刊。
- [9]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 文物出版社, 1991。
- [10]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 中华书局, 1984。
- [11]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农业》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0。
- [12] [南朝]范晔:《后汉书·任延传》卷七十六, 中华书局, 1965, 第 2462 页。
- [13]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 文物出版社, 1981。以下引文一般不再出注。
- [14] 李始文:《中大校园的东汉墓》,《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 年 4 期。
- [15]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 文物出版社, 1988。以下引文不再出注。
- [16] 林蔚文:《百越民族的农业生产》,《农业考古》2003 年第 3 期。
- [17]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三元里马鹏岗西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62 年第 10 期。
- [18] 林蔚文:《百越民族的农业生产》,《农业考古》2003 年第 3 期。
- [19]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 文物出版社, 1991。以下引文一般不再出注。
- [20] 李灶新:《广州秦代造船遗址第三次发掘》, 载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州文物考古集——广州秦造船遗址论稿专辑》, 广州出版社, 2001。
- [21] [汉]司马迁:《史记·平淮书》卷三十, 中华书局, 1959, 第 1437 页。
- [22]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博罗银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 年第 7 期。
- [23] 深圳博物馆:《深圳市叠石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 年第 11 期。
- [24]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 年第 7 期。
- [25]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汉墓》,《考古学报》1978 年第 4 期。
- [26]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曲江马坝的一座西汉墓》,《考古》1964 年第 6 期。
- [27] [南朝]范晔:《后汉书·任延传》卷七十六, 中华书局, 1965, 第 2462 页。
- [28] 蒋廷瑜:《广西汉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1 年第 2 期。
- [29]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佛山市郊澜石东汉墓发掘报告》,《考古》1964 年第 9 期。
- [30] 广东省博物馆、罗定县文化局:《广东罗定背夫山战国墓》,《考古》1986 年第 3 期。
- [31]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增城金兰寺汉墓发掘报告》,《考古》1966 年第 1 期。
- [32]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民族志》,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2。
- [33] 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 农业出版社, 1989, 第 196-197 页。
- [34]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佛山市郊澜石东汉墓发掘报告》,《考古》1964 年第 9 期。

- [35] 朱宏斌:《秦汉时期传统稻作农业科技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东南亚纵横》2002年第11期。
- [36]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横枝岗西汉墓的清理》,《考古》2003年第5期。
- [37] [南朝]范晔:《后汉书·马援传》卷二十四,中华书局,1965,第839页。
- [38]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增城金兰寺汉墓发掘报告》,《考古》1966年第1期。
- [38] 曾广亿:《广东南海汉墓发掘简报》,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第89-97页。
- [40]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上)》,文物出版社,1981,第226页。
- [41]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番禺小谷围岛山文头岗东汉墓》,载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物出版社,2005,第88-106页。
- [42] 吕思勉:《秦汉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第416页。
- [43] 郑君雷:《考古学上的岭南汉代盐官和圃羞官——以香港考古发现和研究为引子》,载《边疆考古与民族史论集》,科学出版社,2019,第273-281页。
- [44]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博罗银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7期。
- [45]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黄花岗汉唐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4年第4期。
- [46]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佛山市郊澜石东汉墓发掘报告》,《考古》1964年第9期。
- [47]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肇庆市康乐中路七号墓发掘简报》,载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深圳博物馆编《华南考古2》,文物出版社,2008,第263-274页。
- [48]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南田路古墓葬》,载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深圳博物馆编《华南考古1》,文物出版社,2004,第199-221页。
- [49] 曾广亿:《广东南海汉墓发掘简报》,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第89-97页。
- [50]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先烈南路汉晋南朝墓葬》,载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物出版社,2005,第49-72页。
- [51]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佛山市郊澜石东汉墓发掘报告》,《考古》1964年第9期。
- [52]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韶关市郊古墓发掘报告》,《考古》1961年第8期。
- [53] 广东省博物馆:《广州沙河顶发现一座东汉墓》,《考古》1986年第2期。
- [54]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番禺员岗村东汉墓》,载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深圳博物馆编《华南考古1》,文物出版社,2004,第222-247页。
- [55]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上)》,文物出版社,1991,第357页。
- [56] 南越王墓鉴定有14种水产品,包括大黄鱼、广东鲂、鲤鱼、真虾、龟足、中华花龟、中华鳖、沟纹笋光螺、耳状耳螺、笠藤壶、青蚶、河蚬、楔形斧蛤等。其中鲤科鱼类、龟鳖类等为淡水生物,耳螺、笋光螺、河蚬等软体动物为半咸水生物,青蚶、楔形斧蛤、龟足等常见于南方沿海。南越王宫苑遗址鉴定的汉代水产品种类有蚌壳、鱼、龟、鳖、鳄等。
- [57] 南朝梁人顾野王《玉篇》记“𩺰,钩逆𩺰也”;西汉刘向《淮南子·说林训》记“无𩺰之钩,不可以得鱼”。
- [58] 《说文》:“𩺰,钓鱼缴也”。
- [59] 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宫苑遗址——1995、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以下不再出注。
- [60]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海幢寺汉代窑场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2003年第3期。
- [61] 谭玉华:《广西贵港梁君垌东汉墓出土陶船模》,《国家航海》2018年第1期。
- [62]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皇帝岗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第4期。
- [63]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东郊汉砖室墓清理纪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6期。
- [64]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黄花岗东汉砖室墓发掘简报》,载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州文物

考古集》，文物出版社，1998，第222-234页。

[65]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番禺区文管会办公室：《番禺汉墓》，科学出版社，2006。

[66]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肇庆古墓》，科学出版社，2008。

[67]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贵港市博物馆：《广西贵港马鞍岭汉至南朝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4年第1期。

[68]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佛山市郊澜石东汉墓发掘报告》，《考古》1964年第9期。

[69]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上）》，文物出版社，1991，第471页。

[70]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1988，第86页。

[71]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增城金兰寺汉墓发掘报告》，《考古》1966年第1期。

[72]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番禺小谷围岛山文头岗东汉墓》，载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物出版社，2005，第88-106页。

[73]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永福路汉唐墓葬发掘简报》，载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物出版社，2005，第73-87页。

[74] 曾广亿：《广东南海汉墓发掘简报》，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第89-97页。

[75] 广州市文物管理处：《广州淘金坑的西汉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76] 曾广亿：《广东南海汉墓发掘简报》，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第89-97页。

[77]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佛山市郊澜石东汉墓发掘报告》，《考古》1964年第9期。

[78] 广州市文物管理处：《广州淘金坑的西汉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79] 广州市文物管理处：《广州淘金坑的西汉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80]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黄花岗003号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4期。

[81] 广州市文物管理处：《广州淘金坑的西汉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82]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汉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83]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合浦文昌塔汉墓》，文物出版社，2017。

[84] 陈丁山：《广西汉代饮食风貌概述》，载广西博物馆编《广西博物馆文集（第三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第129-134页。

[85] 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丰门岭10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3期。

[86]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广西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78。

[87] 广州市文物管理处：《广州淘金坑的西汉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88]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先烈南路汉晋南朝墓葬》，载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49-72页。

[89]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东郊沙河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61年2期。

[90]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南田路古墓葬》，载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深圳博物馆编《华南考古1》，文物出版社，2004，第199-221页。

[91] [南朝]范晔：《后汉书·循吏列传》卷七十六，中华书局，1965，第2473页。